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01期）

“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5年3月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

特朗普“冲击波”及其后果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

特朗普“冲击波”及其后果

报告人：李巍

2025年3月29日

主讲内容

- 第一部分：历史性的对决
- 第二部分：特朗普“冲击”
- 第三部分：中国如何回应

本讲主要论点

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大获全胜，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我们必须正视特朗普背后强大而持久的社会力量，而不能再把他当做一个异数和偶然。我们观察这个“全新的”美国及其影响，需要一场认知上的“范式革命”。

特朗普正在成为一个“帝王式总统”，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破坏力要超过第一任期。特朗普“冲击波”正在全面凸显，经济全球化将加速走向终结，美国联盟体系加速走向瓦解。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特朗普任内的美国将是空前的自私和不讲道德的。

特朗普执政近两个月来的诸多表现，虽有代表正确方向的一面，但大多数呈现出一个“莽汉治国”和“病夫治国”的混乱，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能力对美国进行负责任的改革，反而正在对美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和国际领导地位构成持久而深重的伤害，这给中国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契机，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身健体。

2024年美国大选基本格局：“红潮”兴起

- **总统选举**

哈里斯：特朗普

226：312　（选举人票比）

48.3%：50.0%　（普选票比）

- **参议院选举**

民主党：共和党

47：53

- **众议院选举**

民主党：共和党

213：219

- **州长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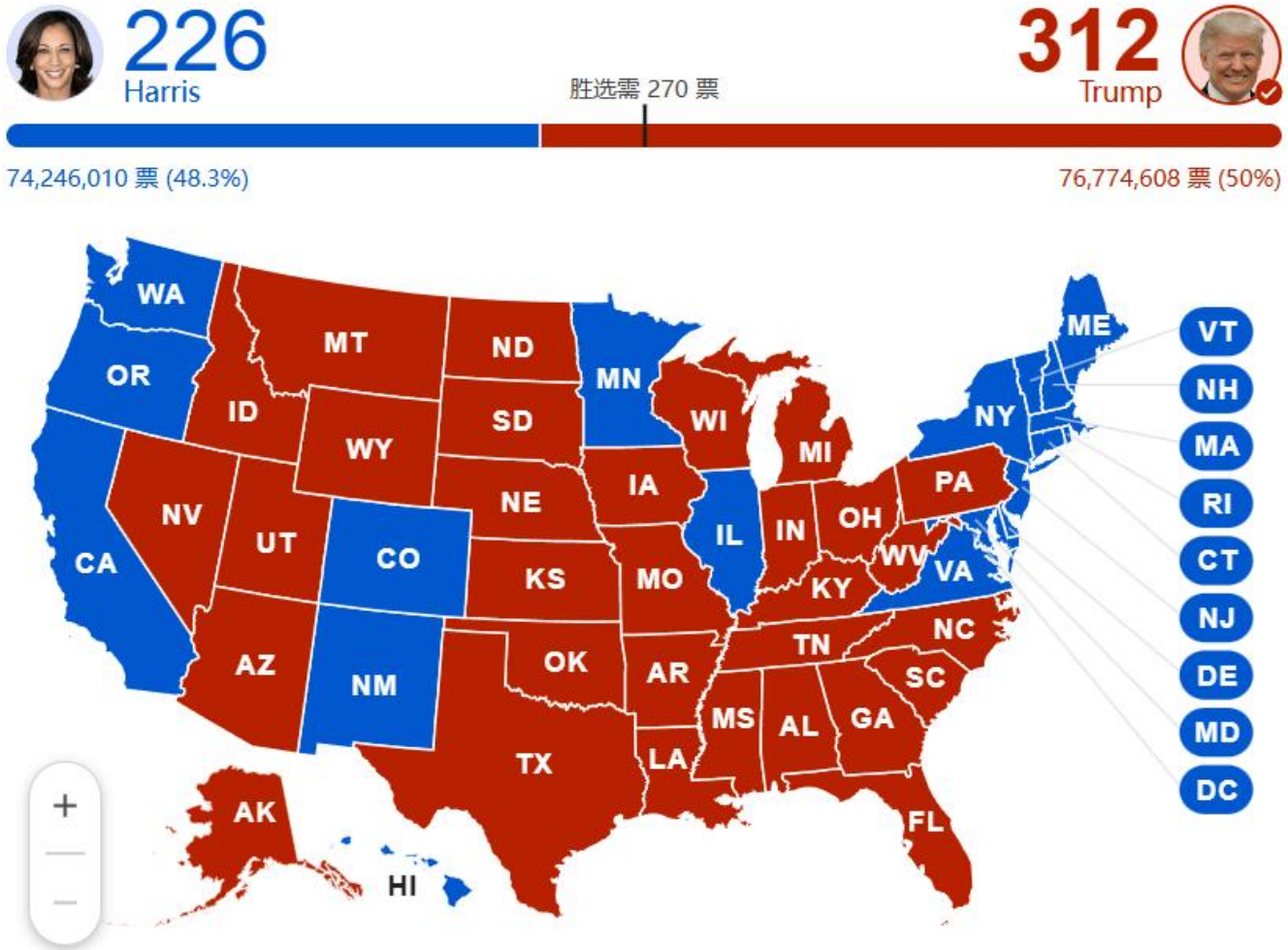
民主党：共和党

23：27

- **最高法院法官席位**

自由派：保守派

3：6



*2020年总统选举7个摇摆州皆为蓝，**2024年皆被特朗普拿下**

强人时代的降临：特朗普“王朝”

- **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实质是精英之间利用制度相互制衡

- **大众政治与强人政治**

强人政治的实质是利用大众力量打碎各种制度

- **特朗普是一场“政治文化”的革命**

他和乔治·华盛顿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极端

贵族政治 VS 流氓政治；协商政治 VS 独裁政治

特朗普的核心内阁团队

职位	姓名	出生年	背景	重要政策立场
副总统	詹姆斯·戴维·万斯	1984年	俄亥俄州参议员	反堕胎、跨性别、非法移民与气候危机论；反对援乌、亲以色列、对华鹰派
国务卿	马尔科·鲁比奥	1971年	佛州参议员	对中国、伊朗和委内瑞拉持鹰派立场
国安顾问	麦克·沃尔兹	1974年	佛州众议员，退伍精英军人	在欧洲中东保持军事存在，但将关键能力转向印太；对华鹰派
国防部长	皮特·赫格塞斯	1980年	福克斯新闻主持，退伍军人	反对军队的觉醒文化；亲以色列，坚决阻止伊朗；希望乌克兰能自卫
商务部长	霍华德·卢特尼克	1961年	华尔街高管	“没有所得税，只有关税”
财政部长	斯科特·贝森特	1962年	对冲基金高管	减少政府开支和保护美国产业
贸易代表	杰米森·格里尔	1980年	前贸易代表的幕僚长	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提高美国反倾销与反补贴能力；支持对华出口管制、投资控制和制裁
司法部长	帕姆·邦迪	1965年	佛州总检察长，特朗普律师	将调查起诉当前司法部的不公平和政治化；保守派代表性律师
能源部长	克里斯·赖特	1965年	石油公司高管	化石燃料的坚定支持者

特朗普团队的特点：“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 **迎战“深层国家”**

  绝对忠诚：门阀政治

  培养梯队：江山传承

  一意孤行：作风强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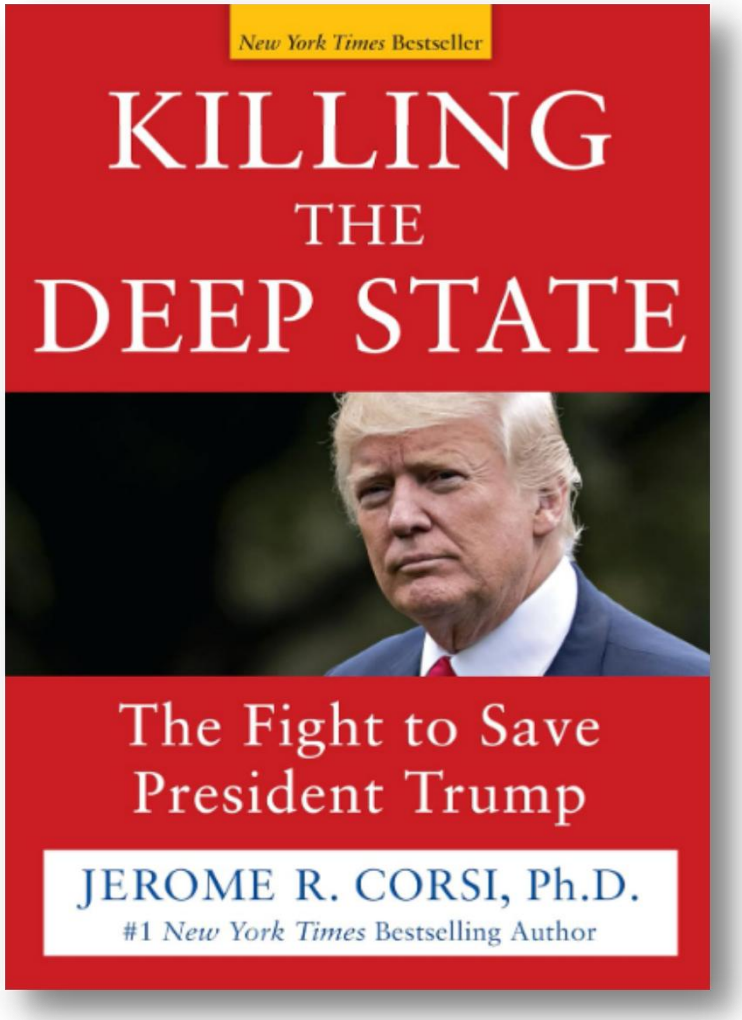
- **四大“利益基础”**

  科技-工业复合体

  金融-工业复合体

  军事-工业复合体

  能源-工业复合体



特朗普的精英支持基础：科技-金融-工业复合体

PayPal帮派如何渗透美国政府

姓名	出生年	名下科技公司及主要业务	在美国政府中的职位
埃隆·马斯克	1971年	SpaceX(商业航空), Tesla(电动汽车),xAI(人工智能),X(社交媒体), SolarCity(光伏发电)	政府效率部主管
大卫·萨克斯	1973年	Craft Ventures(风投)	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
彼得·蒂尔	1964年	Founders Fund(风投),帕兰蒂尔(大数据分析，军事、医药等领域)	无政府职位，但其人脉渗入特朗普内阁
马克·安德里森	1971年	Andreessen Horowitz（投资科技初创企业，近年重仓区块链、加密货币）	无政府职位，但其人脉渗入特朗普内阁

1月21日，特朗普宣布OpenAI、软银、甲骨文和MGX将共同投资建设一个名为**Stargate Project**的公司，旨在为美国的OpenAI构建新的AI基础设施。

- 反对觉醒文化
- 迷恋加速主义

特朗普冲击波·内政

- 提高政府效率
- 削减政府开支
- 收紧移民政策
- 复兴保守价值

  迎战DEI

  迎战LGBTQ+

埃隆·马斯克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DOGE）的其中一位负责人

特朗普新指定的**预算办公室**负责人拉塞尔·沃特表示：“我们必须解决觉醒和武器化的官僚机构问题，让总统控制行政部门。”

特朗普冲击波·国内经济

■ 新工业主义：

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特朗普

降低企业所得税(从21%降为15%)

支持军工业发展

发展传统能源

放松金融和科技监管

美国制造业“失去的十年”：金融诅咒

◆ 1890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 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特朗普冲击波·国际经济

- **关税壁垒**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in the dictionary is tariff. It’s my favorite word. It needs a public relations firm.”
  ----Donald Trump

- **吸引外资**
  - 苹果：5000亿美元
  - 台积电：1000亿美元
- **美元霸权**
- **核心精神：关起门来搞建设**

- 2月1日，宣布对**中国**新加征10%的关税；对**加拿大**非能源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对能源产品征收10%关税（3月4日生效，但部分存在缓税）；对**墨西哥**商品征收25%关税（预计4月初生效）
- 2月10日，宣布对全球**钢铝**进口征收25%的关税（3月12日生效）
- 2月12日，宣布对**汽车**产品征收25%的关税（预计4月初生效）
- 2月13日，宣布对每个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预计4月初生效）
- 2月18日，宣布对**进口半导体和医药产品**征收25%的关税（生效日期待定）
- 2月26日，宣布对**欧盟**商品征收25%的关税（生效日期未定）
- 2月27日，宣布将对**中国**额外再加征10%的关税。
- 3月3日，宣布对进口**农产品**征税，税率未知（预计在4月初生效）
- 3月11日，宣布对**加拿大**钢铝产品额外加征25%关税（次日生效）
- 3月25日，宣布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高达50%的关税；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25%的关税；宣布再次确认对每个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预计4月初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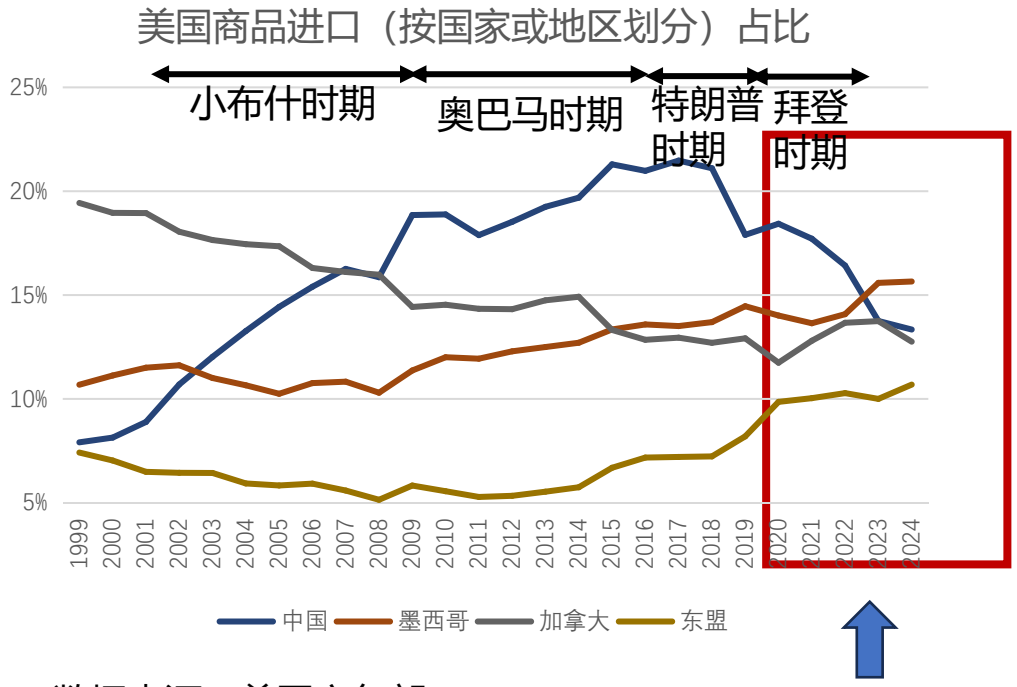
罗伯特·莱特希泽：美国贸易政策的“精神教父”

“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它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

——《没有贸易是自由的》

- 成长于俄亥俄州，认为铁锈带的困境源自于日本的产业崛起，NAFTA，中国入世，以及毒品问题；
- **美日贸易战和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操盘手；
- 其幕僚长格雷尔接任USTR，支持战略性脱钩。

- **贸易脱钩：**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中国在美国进口所占份额出现1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利雅得

特朗普冲击波·外交：从霸权心态转向弱者心态

欧洲方向

- **停止俄乌战争，改善美俄关系**

2月18日，鲁比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月28日，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全世界面前发生激烈争执。

3月23、25日，美乌与美俄于沙特首都利雅得谈判。

- **美欧关系出现新的裂痕**

2月14日，万斯在慕安会大肆批评欧盟。

2月27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

印太方向

- **收割日韩等盟友韭菜**

2月7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

3月14日，韩国被列入敏感国家。

- **美印关系进一步升温**

2月13日，印度总理莫迪访美。

全球治理

- **WTO继续走向瘫痪**
- **气变协议走向夭折**

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

- **聚焦AI发展机遇**

2月11日，万斯在巴黎人工智能（AI）行动峰会上强调本届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立场是聚焦AI的机遇，而非过度关注安全风险。

中东方向

- **继续支持以色列耍流氓**

不想维护国际正义，
不在乎虚妄的战略利益。

特朗普2.0的冲击波·对华

核心是关税：60%

◆ **船运：征收费用**

□ 收费对象

- 中国制造的船只。
- 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
- 船队中中国制造船只占比超过25%的运营商。

□ 收费标准

- 单次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最高收费150万美元。
- 根据船队中中国船只的比例，收费从5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不等。

世界主要海峡及运河

■ 海上博弈新阵地：巴拿马运河

➢ 3月17日，**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宣布，正式启动对全球范围内的海运咽喉要道进行专项审查。

➢ 将系统性重点调查全球七大海峡和航道，分别是：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巴拿马运河、北极航道。

中国的应对措施

- **减少对美国的关注**
  - 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 特朗普正在自废武功
  - 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
  - 发展自己是最好应对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倚天屠龙记·九阳真经》

- **中美博弈胜败在第三方**
- **启动国内大市场**

扩大内需，提高收入

- **以开放应对脱钩**
- **增加中国“磁力效应”**
  - 超大市场磁力
  - 基建设施磁力
  - 理工人才磁力
  - 产业生态磁力
  - 社会秩序磁力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CMF专题报告发布

3月29日，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杨瑞龙、毛振华、徐奇渊、陈琪、陶冬、李巍**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历史性的对决：回溯2024年美国大选

二、特朗普“冲击波”的具体表现

三、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冲击波”

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我们必须正视特朗普背后强大而持久的社会力量，而不能再把他当做一个异数和偶然。我们观察这个“全新的”美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需要一场认知上的“范式革命”。

第二，特朗普正在成为一个“帝王式总统”，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破坏力要超过第一任期。特朗普“冲击波”正在全面凸显，这在全球层面主要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将加速走向终结，美国联盟体系加速走向瓦解，自由国际秩序加速呈现崩溃。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特朗普任内的美国将是空前的自私和不讲道德的。

第三，特朗普执政近两个月来的诸多表现，虽有代表正确方向的一面，但也呈现出相当的混乱，特朗普及其团队还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对美国进行负责任的改革，他们的一系

列行为反而正在对美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和国际领导地位构成持久而深重的伤害。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身健体。

一、历史性的对决：回溯2024年美国大选

2024年美国大选呈现出“一边倒”格局，这一判断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总统选举中，无论是选举人票还是普选票，特朗普所领导的共和党都战胜了由哈里斯领导的民主党。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执政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他未能赢得普选票，仅依靠选举人票胜出。而在2024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的胜利毫无争议，特别是在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摇摆州”，几乎全部被特朗普拿下。

其次，除了总统选举，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也取得了优势。同时，2024年还举行了州长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赢得了27个州的州长席位，民主党仅获得23席，**共和党在州长层面同样占据上风。**

最后，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席位常被公众忽视，但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大法官，其中自由派（代表民主党）法官仅有三位，保守派（代表共和党）法官则有六位。**由此可见，无论是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州政府权力，还是最高法院的权力，共和党均处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2024年美国选举的基本背景与结果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其成为一位“帝王式总统”铺平了道路。结合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特征，可以认为美国正步入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

传统上，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时代，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实质是精英之间利用制度进行彼此的相互制衡。因此，精英政治通常较为重视制度与规则。然而，在“大众政治”时代，往往会孕育出“强人”，“强人政治”的实质是利用大众力量打碎各种制度，以实现其自身意志不受限制的实施。这种转变，正是当下美国政治变化的显著表现。

我们可以基于2024年的选举结果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他和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极端，乔治·华盛顿作为大农场主，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贵族形象，代表了贵族政治和协商政治；特朗普则是在华尔街的底层商战中崛起，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流氓政治和独裁政治。

从特朗普核心内阁团队的背景来看，国务卿鲁比奥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司法部长邦迪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州，三位极为重要的内阁成员均来自佛罗里达州，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用人上的风格。同时，从年龄结构来看，“70后”与“80后”正在美国政坛中全面崛起，例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出生于1984年，国防部长海哥赛斯出生于1980年。

特朗普团队的人事结构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特朗普所任命的官员强调忠诚，具有门阀政治的特点。**他任用如此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政治人物，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在佛罗里达州长期经营，拥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第二，特朗普重视政治梯队的培养。**尽管他本人只能再任这一届总统，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完成自己的任期，更希望将其政治思想、风格与特点传承下去。特朗普可能离开政坛，但特朗普主义不会离开。**第三，团队成员普遍风格强硬，一意孤行，与特朗普个人风格一致。**

特朗普采取以上用人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贯彻其口号——“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即迎战“深层国家”。特朗普认为，在第一任期中，许多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其核心思想没有得到贯彻。他作为一名反建制派总统，遭到了建制派“深层国家”的强力阻碍。所以，他重新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深层国家”。

特朗普此次执政与上一任期相比，呈现出显著不同。上一任期的特朗普展现出强烈的草根色彩，当时美国的精英利益集团对其普遍持保留态度，基本未予以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形象也更多体现为获得大众支持的代表。而在这一任期，越来越多的精英利益集团开始转向支持特朗普，构成其政府的精英支持基础。这一基础主要由四大利益集团构成：**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代表的高科技硅谷精英群体集体性地支持特朗普；**金融-工业复合体**，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华尔街金融家与投资者，而是特指一小部分以加密货币为核心的精英利益群体；**军事-工业复合体**，众所周知，特朗普及共和党长期以来对军工业持积极态度，此次内阁中亦有多位成员来自军方，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大幅削减税收，但却增加了军费开支，显示出其与军工复合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能源-工业复合体**，特朗普当前政策强调对传统能源的支持，其背后主要是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这四大利益集团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此次执政的精英支持基础。

具体来看，目前存在一种说法，即“PayPal帮”正在参与美国的治理。二十多年前，美国一家名为PayPal的企业发明了移动支付技术，其创始人如今大多已成为特朗普政府中的重

要人物，或者没有政府职位，但其人脉渗入特朗普内阁。此外，还有以马克·安德里森为代表的支持加密货币的重要风投人士。该利益群体规模虽小，但力量强大，正在美国政坛上迅速崛起。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的离任演讲中指出，美国应当像当年警惕军工复合体崛起一样，警惕当下正在形成的科技-工业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主要包括以下四位代表性人物：埃隆·马斯克，目前执掌政府效率部，对美国行政体系正在进行革命性改革；大卫·萨克斯，被称为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现任美国PayPal科技顾问；彼得·蒂尔，虽未在政府中任职，但被认为是幕后的关键人物之一，一手栽培了美国史上最年轻副总统之一——万斯；马克·安德里森，在美国长期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

传统的硅谷和华尔街精英在政治立场上大多倾向于民主党，而这批科技与金融领域的精英新秀可被归类为右翼势力，转向支持共和党。他们主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反对民主党所倡导的“觉醒文化”**，在价值观层面，特别是社会价值观上表现出较强的保守倾向；**其二，推崇“技术加速主义”**，具备典型的“理工男”特征。例如，马斯克是技术万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坚信技术正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并能解决所有问题。

二、“特朗普冲击波”的具体表现

第一，“特朗普冲击波”在**内政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高政府效率。**该阵营的成员大多出身于企业界，他们特别强调效率，试图将治理企业的逻辑应用于政府管理之中，对提升政府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削减政府开支。**除减税政策外，特朗普政府效率部正在推进大规模的政府开支削减运动，关闭了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项目。**三是收紧移民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中下层、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打击措施趋于严厉，但对于高科技人才的移民政策仍然持开放态度。**四是复兴保守价值。**集中体现在迎战“DEI运动”（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和与LGBTQ+相关的“觉醒运动”。

特朗普新指定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要负责财政与预算管理，该负责人公开表示，必须解决“觉醒运动”及武器化的官僚问题，强调应由总统控制行政部门的运作。所以，美国国内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于重新确立总统对行政权力的掌控，削弱建制派的“深层政府”对国家治理的控制。同时，还要解决近年来泛滥的“觉醒运动”和“DEI运动”。

“特朗普冲击波”在国内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一个核心大战略，即复兴制造业。当前，美国政治生态高度极化，尤其在过去十年间，许多问题上呈现出“非黑即白”的投票模式，凡是民主党支持的，共和党通常反对；凡是民主党反对的，共和党则大力支持。但在这种极化格局中，仍然存在两个基本共识：其一，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二，复兴国内制造业。特朗普再次上任后，可以预见其将继续大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

制造业复兴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并成为两党基本共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战略精英都深刻认识到，美国正陷入一种“金融诅咒”。自1890年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构成了20世纪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实力基础。然而，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以上。美国担忧若这一趋势持续，其全球霸权地位将可能被中国削弱和取代。

基于这一战略共识，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坚定发展传统能源**，不再相信所谓“气候变化”；**放松金融与科技监管**，全面打响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领域与中国的新一轮科技竞争；**降低企业所得税，从21%降为15%**，为了实现制造业复兴，必须通过减税招商引资，“15%”是一个临界值，源于G20成员国曾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为防止主体间的恶性竞争，各国承诺企业所得税不得低于15%；**大力支持军工业发展**，军工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德国与日本曾一度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军工业支撑，最终遭遇发展瓶颈，特朗普此次上任后，也迎合军工复合体的要求，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军工业的发展。

“特朗普冲击波”在国际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关税冲击波”。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有大量关于关税的设想尚未得以全面实施。此次重新上台后，特朗普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举措，便是推出一套更为全面、涵盖更多贸易伙伴、更多产业，且密度更高、手段更为激进的关税政策。2025年2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关税措施。预计至4月1日，美国在对整体贸易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估之后，可能还会出台更加正式且广泛的关税政策。所以，关税政策已成为特朗普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并维持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而这一体系很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被彻底颠覆。除了关税壁垒，特朗普还致力于吸引外资，延续前财政部长耶伦所推动的近岸外包和回岸生产等一系列产业战略，旨在服务于复兴国内制造业的战略方向。

除“星际之门”计划外，苹果与台积电等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先后作出在美投资的承诺。苹果承诺将在美国本土投资5000亿美元，作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无工厂”企业之一，主要负责产品设计，甚至不直接参与组装，其核心产业链高度依赖东亚地区。此次，苹果在特朗普上任后为响应其战略方向，作出在美投资的承诺，尽管该承诺最终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但支持态度已经明确。此外，台积电也宣布将进一步追加在美国本土的1000亿美元投资，呼应特朗普提出的制造业复兴战略。

特朗普将继续捍卫美国霸权，但最终奉行何种货币政策目前难以明确判断。理论上，为了促进美国本土投资、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特朗普应采取一定程度的美元贬值政策，但美元贬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对美元霸权极为重视，坚决反对金砖国家的“去美元化”措施。对于如何在维护本土制造业的同时，又维护美元霸权，特朗普尚未提出明确或系统的政策思路，其执政团队似乎也尚未就此问题达成清晰共识。纵观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通常难以兼得，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取舍关系。例如，英国在19世纪逐步确立英镑霸权地位之后，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美国的发展轨迹也呈现出类似特征。**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的并存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将成为特朗普执政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美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核心精神来源于罗伯特·莱特希泽，他被视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精神教父”。虽然莱特希泽并未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中任职，但其政治思想的继承者目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有一句颇具影响力的名言：“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它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这一观点对美国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裔经济学家张夏准曾著有《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提出了“富国陷阱”的概念，指出发达国家在达到发达水平后，往往会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国家达到同样的水平。“踢掉梯子”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会采取保护幼稚产业、侵犯专利和商标权等措施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一旦成为发达国家后，则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和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从而阻止其他国家通过类似手段达到同样的水平。基于上述理论，美国若希望重新成为生产大国，就必须摆脱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结构，回归以生产为本的战略路径。

罗伯特·莱特希泽的思想源于个人经历，他成长于俄亥俄州，认为铁锈地带的困境源自于日本的产业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中国入世和毒品问题。同时，他是美日贸

易战和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操盘手，其幕僚长格雷尔接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支持战略性脱钩。所以，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总进口中的占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逐渐被加拿大和墨西哥所取代，中美经贸关系正朝着“脱钩”方向发展。如果特朗普目前对中国的关税水平达到40%，未来甚至可能进一步上调至60%。一旦“60%关税”成为常态或长期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可能只是“程度”问题。

特朗普的“外交冲击波”在多个方向上均有体现。在**欧洲方向**，特朗普致力于停止俄乌战争，美俄关系开始出现靠近趋势。关于美俄走向接近的原因较为复杂，可能因素包括：一是双方存在某些共同的保守社会价值观；二是两国都推崇“丛林政策”与“强人政治”；三是特朗普曾在其早年获得来自东欧资本的支持等。此外，美欧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欧洲开始进一步强化“战略自主”。长期以来，欧洲被视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军事上的侏儒”，但此次欧洲承诺投入6000亿欧元进行再武装，这一举措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究竟是走向全面战略自主，还是继续依赖美国、熬过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对此，欧洲内部存在分歧。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欧洲历次一体化几乎都是在危机推动下实现的。此次能否借助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危机，在军事、政治与财政一体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仍有待观察。

在**印太方向**，美国将继续从日本和韩国盟友中获取战略利益。同时，美印关系也有可能进一步升温。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再度上任后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

在**全球治理方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无疑将继续陷入瘫痪，甚至有走向解体的可能。特朗普已公开宣称拒绝向WTO缴纳会费，美国以往尚未出现拒缴WTO费用的先例，此次则明确表达了拒绝承担WTO相关责任与义务的立场。气变协议走向夭折，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

在**中东方向**，美国大概率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派，并对沙特施压以获取额外利益。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从“霸权心态”向“弱者心态”的转变。他既不愿再为维护国际正义承担责任，也并不在意虚妄的战略利益。特朗普曾提出，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对我们都是不公平的。

在对华问题上，特朗普的核心手段仍然是关税。虽然其关税政策面向全球，但重点对象仍是中国。在特朗普重新上任后，美国已对中国实施了两轮关税加征，当前对华商品的平均

关税接近40%。接下来，特朗普可能将兑现竞选期间的承诺，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

除商品关税外，美国还计划对中国的船运加征关税。众所周知，美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马汉的“海权论”，长期以来，美国是一个海洋强国。但美国认为在海洋领域的主导地位正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美国造船业明显衰退和在全球海上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拟对中国制造的船只、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船队中中国制造船只占比超过25%的运营商征收费用。收费标准为单次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最高收费150万美元；根据船队中中国船只的比例，收费从5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不等。

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之间的海上博弈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中一个焦点是巴拿马运河的博弈。2025年3月17日，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宣布，在特朗普政府的授权下，已正式开始对全球海运关键通道进行专项审查。根据美国法律，该委员会将形成一份审查报告，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此次收费措施仅仅只是初期试探行为，未来在海上特别是涉及关键海峡与航道中，双方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根据联邦海事委员会的行政令，将系统性重点调查全球七大海峡和航道，分别是：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巴拿马运河、北极航道。这些航道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大宗商品运输，直接影响国际供应链稳定。这是继关税之后，对中国外贸构成的第二大冲击和风险。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全球绝大多数的对外贸易依赖于海上贸易。因此，这一趋势值得未来持续观察与深入研究。

近期，美方还对中国展开新一轮制裁，美国商务部将54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在技术领域的制裁不仅不会停止，反而将进一步升级。

三、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冲击波”

面对当前这一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应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第一，减少对美国的过度关注，避免被其牵着鼻子走。目前，特朗普所采取的许多举措，实际上是在“自废武功”。**我们应按照自身的节奏推进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将发展自身作为首要任务，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正如外交部长王毅同志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引用的一首诗：“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面对强悍和霸道的对手，我们不应被其牵制，应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中美博弈的胜负关键并不在于双方本身，而在于能否争取第三方的支持。我们应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在当前中美竞争格局中，谁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到更多的第三方支持，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因此，我们应将更多的战略精力投入到第三方合作与国际伙伴关系的拓展中。

第三，着力启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这已成为我国当前紧迫的战略任务。过去，我国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美欧市场，但未来美国市场将不再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产品可能很难再进入美国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调整思路，充分激活和利用我国14亿人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超大规模市场。

此外，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外部“脱钩”压力。这一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推进。过去两年，我国在最成功的开放政策之一是对除美国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施单边免签政策。该政策收效显著，取得了良好国际反响，今后，我们要多采取类似的政策。

最后，通过持续扩大开放、激活国内市场，增强中国对全球商业力量的“磁力效应”。具体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超大市场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基础设施的磁力效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理工科人才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理工科人才储备；**产业生态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生态；**社会秩序的磁力效应**，中国整体社会秩序保持稳定，相较之下，当前西方国家在移民等问题的影响下，国内社会秩序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正是由于上述多方面优势，使得中国如同一块“吸铁石”，具备吸引全球商业资源的能力。只要我们持续发挥中国的磁力效应，美国若试图与中国“脱钩”，最终被孤立的将是美国自身。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特朗普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而非国际问题。**近年来，美国政治由“钟摆式”转为“极化式”变动，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价值观和政策方向上的分歧日益激烈。特朗普凭借民意基础再次上台，但其能否真正整合国内利益、推动再工业化，仍有待观察。在国际层面，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策略是增强自身实力、削弱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是特朗普的明确主张**，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变化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考量，他试图结束欧洲纷争以集中资源应对中国。

特朗普执政倾向于孤立主义，并可能继续退出国际组织，重塑盟国关系结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应秉持“做好自己的事”原则，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主动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争取和平发展环境，避免与美国的激烈冲突，但也要展示出我们的韧性、理性和正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陈琪**认为，“特朗普冲击波”可理解为特朗普政策的特殊性，即其政策议程或理念中与他人不同的部分。**从当前情况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对美国国内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尽管国际社会仍在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变化及其带来的外部影响，但其国内政策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在国际问题中，中美贸易问题当前备受关注。其关键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认知上存在不对称性**，中国主张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认为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解决贸易纠纷并开展合作；而特朗普则采取相反策略，故意制造不确定性，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达成交易并获取利益。**二是双方在谈判风格上存在差异。**中方倾向于先从工作层面解决问题，再由高层确认；而特朗普更偏好通过高层直接决策，自上而下推动谈判。此外，**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存在达成交易的困难**，根据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需大量购买美国产品以填补特朗普所要求的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不断扩大，导致贸易逆差难以通过正常交易弥补。

淡水泉（香港）总裁**陶冬**指出，海内外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难以捉摸、不可预测的人物，其战术运用的确变化多端。然而，从战略层面来看，特朗普的立场却异常稳定，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展开。所谓“MAGA”，对内而言，首先，特朗普希望彻底铲除奥巴马、拜登连续执政期间所形成的“白左”思潮，推动去极端化。其次，他意图打破美国的深层政府结构。第三，特朗普希望建立一个他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经济运营体系，即低税率、高关税、去监管以及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

“MAGA”在海外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彻底打破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经贸地缘政治秩序。其二，从自身利益出发，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局面。其三，在地缘政治方面，他希望尽快从乌克兰问题中脱身，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

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基于此，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特朗普主义长期化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的准备；着力发展内需市场，立足自身；要与美国保持对话，也要积极改善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徐奇渊**从党的三大法宝出发，分析如何应对“特朗普2.0冲击”。其中，党的三大法宝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首要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当前的“斗争”应以合作为最终目标，通过“斗争”寻求合作，这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三，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处理好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则**，具体来看，我国在应对贸易摩擦时采取了“扭抱缠斗”的策略。

我国应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国内拓展至国外，将第三方国家中能够团结的力量纳入其中。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但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经济冲突。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更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重要切入点。如果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净进口市场，向全世界提供需求，那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将从竞争转变为互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特朗普一系列政策安排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是特殊事件，美国曾经历过五次关税浪潮，其规模与影响不亚于当前“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美国对关税的理解和运用与我国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来分析其对关税的战略认识与政策逻辑。从历史梳理中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一是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二是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此次“特朗普2.0”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文化并不像当前某些舆论所宣扬的那样，对“关税战”普遍持反感态度。第二，在“关税战”的推进过程中，美国的内部政治分裂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第三，当前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呈现“脱实向虚”特征，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所以，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停留

在“就关税谈关税”的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所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

历史维度下的“特朗普关税冲击”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大幅度提升关税、放松管制、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实现美国再工业化与美国再强大的目标。这一系列的政策操作超越了大部分人所能理解范围，但如果从美国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关税冲击是否属于特殊事件呢？是否仅是特朗普个人特立独行之举，缺乏历史基础与文化积淀呢？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非首次。**纵观历史，美国曾经历过五次关税浪潮，很多次的关税冲击的规模与影响并不亚于当前“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

一、美国五次关税浪潮

关税在美国建国历史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英国对殖民地的高额征税政策，如《印花税法案》和《汤森德法案》。在美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核心来源就是关税。**因此，关税文化在美国联邦体系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第一，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1861年国会通过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莫里尔关税法案》，并对工业化进程寄予了高度期待，希望通过征收关税以推动美国北方的工业化发展，但这一举措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历史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南北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因为废奴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在关税政策上的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代表北方工业化体系的利益集团主张实行高关税，以扩大国内市场并推进本土工业发展；而南方的经济命脉是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庄园主群体则主张低关税，倾向于将棉花大规模出口至英、法等欧洲国家，并进口纺织品。南北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关税政策密切相关。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关税始终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关税是美国擅长运用的政策工具，但也曾在历史上引发严重的国内分裂。

第二，在南北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镀金时代”之后，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以推行高关税著称。1890 年，时任国会议员的他提出《麦金莱关税法案》，将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提高到49.5%。1897年，麦金莱作为总统支持通过了《丁利关税法案》。这些法案均以征收高额

关税为核心内容，核心目标是通过高关税政策加速推进美国工业化进程，使美国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在1890年至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美国的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一成果被认为是麦金莱关税政策推动下的重要产物，也正因如此，麦金莱成为特朗普最为敬仰的美国总统之一。特朗普从1890年代的关税政策中得出结论，关税是一项“好工具”，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工业化。但是，美国工业化是自身发展的产物还是关税促推的产物依然是一个历史难以澄清的课题。

第三，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将当时的大萧条归因于外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因此期望通过征收高额关税以重整国内市场、重建美国工业体系，摆脱经济危机。所以，该法案的核心措施是对其他国家商品征收高关税。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法案，出台后遭到世界各国的全面反制，不仅没有挽救美国经济的萧条局面，反而使美国经济在各国的反制下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因此，《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关税负面作用的典型案例。

第四，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尼克松冲击”。这一事件在很多方面与“特朗普冲击波”具有相似特征。“尼克松冲击”的主要内容包括：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原本对世界各国美元持有者的黄金债务一笔勾销；对美国所有涉税进口品临时（90天）征收10%的附加税。“尼克松冲击”之后，各国于1971年底签订了《史密森协定》，将美元对黄金贬值7.89%，同时将美元较主要货币贬值10%。由此可见，“尼克松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五，1985年美国与日本爆发贸易冲突，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求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及自愿扩大进口，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同时推动美元贬值，日元大幅升值。这就是导致日本失去30年的核心诱因之一的著名的**“广场协议”**。

综上所述，美国在历史上多次主动采取关税或类似干预政策，这并非偶然现象。**美国对关税的理解和运用与我国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来分析其对关税的战略认识与政策逻辑。**

二、美国关税政策与再工业化的历史结论

从以上历史梳理中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第一，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主义极力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关税，而杰克逊主义则反对关税。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支持关税政策，而南方则持反对态度。1890年麦金莱政府时期亦是如此，共和党主张征收高关税，而民主党持相反立场。大规模的关税战一方面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分裂有关。因此，美国关税政策的持续性往往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分裂的情况。关税政策的推行与某些关键历史人物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例如麦金莱最终遭到刺杀；胡佛因大萧条而败选；面对国会的弹劾压力，尼克松在众议院就弹劾条款投票前夕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第二，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超越工业化阶段的美国无法实施“再工业化”。美国在1860年左右及1890年左右推行的一系列关税政策对早期工业化和加速工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政策效应仅在美国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加速发展阶段时才得以体现。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在胡佛时代，美国工业体系在大萧条中遭受严重打击；在尼克松时期，尤其是《牙买加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在与德国的汽车工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在广场协议之后，里根政府的7大产业再工业化也以失败告终。

三、应对“特朗普冲击波”的历史启示

对于此次“特朗普2.0”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文化并不像当前某些舆论所宣扬的那样，对“关税战”普遍持反感态度。**事实上，在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中，美国非常擅长将关税作为工具服务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及各类政策目标。

第二，在“关税战”的推进过程中，美国的内部政治分裂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这种趋势可以从历史中多次印证，例如，汉密尔顿主义作为早期主张关税政策的重要思想，其代表人物汉密尔顿最终死于决斗；1860年前后的关税政策成为南北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麦金莱关税法》和《丁利法案》在推动高关税政策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麦金莱遇刺身亡。所以，关税在某种程度上既是美国内部分裂的产物，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分裂局势的加剧。**因此，能否顺利推进特朗普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通过“再工业化”整合美国的国内利益。但从目前来看，这一点难以实现。**

第三，美国再工业化之后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都难以破解“再工业化难题”。当前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呈现“脱实向虚”特征，导致美国难以实现工业技术的重新商业化和体系化。即便政府采取财政补贴、“大棒+胡萝卜”等政策，也很难真正重塑制造业竞争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制造业仍难以与中国的产业体系进行抗衡，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实现。新特里芬难题决定了美国在美元超级储备体系中必定陷入空心化和债务化的泥潭，美国难以寻找“金融控制力”与“产业竞争力”相互协调的新路径，特朗普2.0不仅难以有真正自洽的哲学理论基础，同时也没有可行的行政实施路径。**

因此，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停留在“就关税谈关税”的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所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在这种结构性变化和整体性变化中，包括一系列值得重点关注的参数：（1）美国股票市场短期波动是否将引发美国国债市场价格的波动，进一步引发美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2）美国在近期贸易战、关税战过程中，经济会不会出现加速萧条？（3）当前多重冲突背景下，美国是否将面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压力？（4）在现有的内部减税与外部加关税的政策组合下，美国能否有效缓解财政赤字与债务危机？（5）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遭遇滑铁卢事件？

冷静应对“特朗普冲击波”，做好自己的事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101 期）上的发言

在美国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约束下，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执政背后是美国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最基础的民意，理解这一基本逻辑，对于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特朗普冲击波”是十分重要的。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由盟国政治转向孤立主义，美国优先原则下，强大自己的同时也在着力削弱竞争对手，甚至企图向全球征税以改变自认为的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后续，预计特朗普可能会推动竞选时期提出的“向中国征收 60%以上的关税”等措施落地。但不管特朗普的非理性政策落地与否，我们都应该冷静应对这一挑战，做好自己的事的同时，主动积极处理我们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积累筹码，以取得决战的最终胜利。

一、特朗普再次上台的背后是美国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最基础的民意

在美国的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约束下，特朗普再次上台本质上是两党博弈的最终结果。美国是两党制，两党的政治观点在很多方面是截然对立的。过去这些政治观点会类似于钟摆左右变化，但变化幅度有限，并且出现问题能迅速调整，所以在执政优势和资源的支撑下，过去美国大多数总统都能够连任。但是，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把美国的政策推到了向右的极端，之后在拜登总统任期内，民主党又迅速左倾，且幅度更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钟摆频率变高、幅度加大，而且都突破了原来的政策边框，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在两党博弈下，民意依旧是决定谁能执政的重要因素，本次美国大选也不例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特朗普上台执政就会破坏美国历经 250 年发展所奠定的政治基础与基本制度，进而使美国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甚至将其拖垮，应该充分认识到，美国国内政治才是决定特朗普能不能干、有没有权力干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再次上台有多重因素支撑，民意是取胜的关键性因素。特朗普本次上台拿到了所有摇摆州的选票，创造了历史，背后既有资本的转向，以及特朗普在中枪之后的表现等因素，但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美国国内民意的支持。虽然在我们这些外国观察者看来，特朗普的某些政策对现有规则形成了挑战，但实际上，特朗普的政策在美国国内民意较高，美国国内

并不觉得特朗普的政策是鲁莽之举。往后看，特朗普上台后着力培养 80 后作为共和党的下一代接班人，这一代接班人能否顺利接班，依然取决于美国国内民意，这既包括诸多带有美国国内浓厚的价值观的因素，例如堕胎、拥枪和传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拜登政府未能实现连任与美国国内高通胀预期密切相关。所以特朗普上任后在短时间内出台了大量引人瞩目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国内经济，积极向选民兑现承诺，以巩固民意。

二、孤立主义倾向下，美国着力削弱竞争对手、退群不主战

传统上，美国国际政治的核心是盟国政治，这一策略在过往的实践中帮助美国实现了诸多战略目标，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特朗普可能认为，在当前世界博弈格局下，这一策略存在由优势转化为负担的可能性，因此，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显示出孤立主义倾向，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本次特朗普上台依然延续了这一提法。特朗普认为，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方面是要提升美国自身实力，包括制造业回流、维护美元霸权等，夯实“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要削弱竞争对手，甚至演变为即使会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一定损害，也要通过一些非理性政策损害其他国家经济，这种“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错误思维给全球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削弱竞争对手是美国实施孤立主义的重要战略。我们要观察美国会把哪些国家作为主要竞争对手。首先，特朗普在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启了与中国敌对性的全面竞争，这是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再次上台后特朗普也会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对于俄罗斯，特朗普并不认为俄罗斯足以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更倾向于采取一系列手段稳住俄罗斯，避免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造成过大的冲击与干扰。对于欧洲，虽然欧洲推出了欧元，对美元霸权形成了一定冲击，但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国家之间的矛盾较多，欧元并没有真正起到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作用，因此欧洲是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潜在竞争对手也值得讨论。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对中、俄、欧采取了不同的战术。美国现在急于结束俄乌战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的真实目的可能在于，一方面要全力应对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大幅恶化，还在经济总量上对美国形成挑战，因此美国想从欧洲抽身，将战略重心聚焦中国。另一方面则是要让欧洲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美国认为，欧洲大量的财政资金都用来支撑其高福利体系，但军事责任却由美国来“买单”，俄乌战争

中美国承担了较高的军事援助费用，美国对此较为不满，希望能够让欧洲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和经济成本。但美国战略收缩后还能否继续维持美元霸权，以及欧美之间的经济利益如何分配，供应链依赖如何解决，都还需进一步讨论和考量。对于俄罗斯，美国认为现在的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中、美构成三角博弈，反而是企图让俄罗斯重回西方体系，将 G7 重新拓展回 G8，扩大美国联盟战线。

差异化的战术与孤立主义倾向对国际秩序产生冲击，美国“退群”但不“主战”。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出现之后，特朗普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甚至还威胁退出联合国。但在对外战争上，除了特朗普支持以色列这一政策比较特殊以外，其他方面特朗普并不倾向于引发战争冲突。尽管美国挑起了与巴拿马、加拿大和墨西哥、格陵兰岛等一系列纷争，但并不希望其演化成敌对态势，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美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会单纯地因为关税等问题就崩盘，它们本质上仍然是美国的盟国。

三、冷静应对，做好自己的事与处理好外部关系两条腿走路

尽管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政治基础和历史渊源，但最终是否会回归孤立主义有待观察和分析。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例一度高达 77%，尽管现在下滑至 65%，但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的背景下，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对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构成威胁，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2018 年访美后，通过与美国学者的交流，我认为美国对华将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与盟国一起与中国展开全面冷战。但当时美国与盟国关系不佳，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拜登奉行盟国政治，上台后即着手修复与盟国的关系，尽管美国的“脱钩”最后变成欧洲提出的“去风险”，但本质上是加强与欧盟的一致性来对抗中国。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升级与中国的贸易战，脱钩方式或将发生变化。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进一步升级了中美贸易战，连续两次加征关税，后续可能进一步加征关税，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 60%，甚至 70%以上，同时还要警惕特朗普提出的“去中国化”等极端措施落地。与拜登不同的是，特朗普基本不会考虑与盟国的相关安排，而是选择单方面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脱钩是否还会沿着原来的方式进行值得讨论。另外，传统上认为，特朗普的利益诉求集中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不理性地提高关税税率就基本相当于放弃经贸关

系，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获取哪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取这些利益，特朗普能够承受多高的成本？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冷静看待“特朗普 2.0”对中国的影响，着力做好自己的事，并积极处理好国际关系，为中国发展争取时间。特朗普对美国发展的布局无法在其四年任期内完成，那么四年之后美国的民意如何，特朗普及其目前的 80 后团队在四年后是否依旧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些都需要观察。与之相比，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更加重要。**一方面应该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当前要努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加速自身发展，避免与美国的直接正面冲突，这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利益。**我认为今年以来美国两次加征关税后我们的反应非常有智慧，第一次加征关税后，我们凭借准确的预判，在五天后即出台了应对措施，第二次加征关税后，我们没有仓促应战，作为全球贸易大国，我们手上有足够的筹码，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应该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向世界表示友好的姿态。**当前，我们与日、韩的合作加速回暖，与欧洲的关系也正在改善，我们要认真处理国际关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

总体来说，我们要客观看待特朗普再次上台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要冷静应对，提前做好特朗普后续进一步采取非理性行动的准备，并做好自己的事，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尽量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或把与美国最终决战的时间往后延，这样在最终决战到来时我们才更有筹码。我们不缺乏战斗性，但不应着眼于显示战斗姿态，取得战斗的最终胜利才是我们的目标。

以党的三大法宝来应对“特朗普2.0冲击”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徐奇渊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如同打台球时大力出奇迹，特朗普2.0的冲击带来了诸多变数。在此过程中，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自特朗普1.0开启的贸易战，至今已满7年，如今我们正面临特朗普2.0阶段。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总结过去7年的经验。实际上，党的百年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经验，这对于总结过去的7年、更好应对当前外部冲击，也是很好的历史借鉴。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历史上的第三份重要决议。这份决议再次强调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三大法宝。**三大法宝包括：党的建设；敢于斗争**；扩大**统一战线。其中第二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的是武装斗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则更多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其形式和对应主体随着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时期转变而发生了变化。这三大法宝，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实践反复得到验证的宝贵经验。**党的建设，实际上对应于把自己的事做好。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主要对应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处理。扩大统一战线，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把朋友做得多多的。**下面借鉴这三个角度，来谈一谈如何应对新的外部冲击。

一、党的建设：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于党来说，党的建设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阵脚要稳。在当前国际形势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首先也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回顾过去7年，美国两届政府的关税、制裁政策都直接指向中国的制造业。其他也有投资、金融方面的政策，但实际上最终也指向制造业。但是在过去的7年中，中国的制造业表现强劲。不论是出口份额，还是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提升，甚至招致了“产能过剩”的批评和担忧。同时，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领域，中国近年来也取得了快速突破，进展很快。总体而言，美国针对中国制造业所采取的限制发展措施并未取得成功。可以说，仅仅从制造业领域来看，过去7年我们成功应对了美国的压力。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确实面临一些压力，尤其是近年来内需不足的挑战突出。这也比较好理解，比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对经济增速形成了拖累。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关注服务业，事实上，在前面提到制造业表现强劲的背景下，我国的服务业发展面临一定的停滞。在过去7年中，特别是过去的4、5年中，制造业、服务业部分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反差。总体而言，从过去7年来看，我们很好应对了外部冲击对制造业可能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制造业发展得相当好），但是国内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系统性问题更加突出了。

除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关系需要更好的平衡，外需和内需的关系也要更好的平衡。2024年，净外需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30%、拉动增长1.5个百分点。回忆2020年，中央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点内容，就是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降低外需的依赖，让国民经济循环更多依托于内需。但是过去7年间，我们对外需的依赖仍然较高。现在沃尔玛、COSCO 向中国企业施压降价，试想：如果现在我们的内需强劲，PPI 不是处于负值、而是处于正值区间，中国企业在面对压价时就会更有谈判能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全面扩大内需置于首位，而且特别强调扩大内需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工作。

中国发展空间巨大，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大有可为。当前，我国人均 GDP 约为在1.3万美元左右，美国是8万多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6到1/7。差距大是压力也是空间，尽管我国在技术突破方面暂时面临一些瓶颈和障碍，但是也要看到，除了科技领域之外，我国在诸多领域都存在大幅改善提升的空间，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政府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等等。只要在某个关键领域中实现重大突破，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就将进一步打开，与美国的差距也将明显缩小。只要我国人均 GDP 仅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就可以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越。因此，在高度关注科技力量对比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内的结构性与系统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信心，将发展重点聚焦于国内，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经济健康发展，在中美双边关系上我们的底气就更足了。因此，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我们要有系统性的思维，平衡好应对外部冲击和国内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扭抱缠斗

在中美双边关系的诸多领域我们都面临着斗争的压力，在关键时候必须应招、出招，这要求我们必须敢于斗争。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善于斗争。当前，美国有一部分人主张中美经济

关系应该脱钩，持有这种极端观点的人往往对华态度最不友好。他们恰恰最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对中国加关税，中国全面反制，然后冲突失控、无限升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强调善于斗争，避免陷入对方设定的思维框架，避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具体来说，善于斗争要求我们努力做到扭抱缠斗：

一是反制要精准有力。例如在2024年5月，拜登政府对中国价值2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我国的反击措施就可以概括为精准有力。尽管回击的金额并非完全对等，但注重打击对方的痛点。例如，将美国相关企业纳入实体清单，或者针对特定农产品进行精准打击。二是在精准反制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发展双边的贸易、投资联系。三是扭抱缠斗的策略也要升级。如果说扭抱缠斗1.0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直接绑定，那么通过第三方国家来实现中美关系的间接绑定就是扭抱缠斗2.0。中国和所有非美国家都有紧密的经济联系，那么美国也难以摆脱与中国的间接经济联系。

三、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我们需要把统一战线从国内拓展至国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但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经济冲突。后者并不是根本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改善的。有个数据我们要注意，来自 WTO：我国所遭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只有34%来自美国，而接近三分之二的措施则来自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巴西、印度、东盟国家等，甚至包括巴基斯坦。

非美国家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原因值得思考。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我国与160个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中，对120个贸易伙伴表现为顺差。我们最近与欧洲同事交流，他们提到，汽车是欧洲的支柱产业，其中德国有800万汽车产业工人，如果这个产业在未来失去竞争力，就业形势将极为严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经济压力很大，在过去这些年的科技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形势之下，感觉到沮丧、焦虑。因此对于这些第三方国家，我们应当换位思考，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开放格局，平衡才更加可持续；同时还要致力于塑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格局。

四、从三个层面来看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实际上，扩大内需战略也关系到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所以，还是回到最前面讲的扩大内需。我们要从三个层面来认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第一个层面，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政策，是逆周期调节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点，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眼点。中国应将总需求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依赖内需，而非过度依赖外需。事实上，美国作为典型的超大型经济体，其经济循环也主要依赖国内需求。因此，扩大内需不仅是一项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它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期任务。

第三个层面，扩大内需也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关键。如果中国能够更多进口，甚至向全世界提供净需求，那么中国与很多经济体的关系将从更多竞争转变为更加互补。我们看到，全球有三大经济区：一是欧盟，其内部贸易占全部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二是北美，美墨加三国经济联系紧密，加拿大、墨西哥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经济凝聚力也很强，美国是核心。三是东亚地区，这个地区的内部贸易比例较低，我这里的数据比较旧，只有40%多。现在东亚地区的国家主要仍是出口导向，都很依赖对欧美的出口，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很明显。在这种竞争格局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时，其他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可以更多出口到美国。这种经济基础，必然导致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凝聚力较弱，而离心力较强——虽然中国是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最后，回到三个法宝的角度：其一，扩大内需是当前做好自己事情的最直接体现。其二，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越成功，我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斗争地位就越主动、就越有利。其三，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也应当全方位扩大内需，与第三方国家实现更加平衡的经贸关系，这也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关键点。

“特朗普冲击波”与中美贸易难点分析

陈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陈琪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一、特朗普政策的冲击性

“特朗普冲击波”可理解为特朗普政策的特殊性，即其政策议程或理念中与前任不同的部分。无论是其政策理念方向，还是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措施，均与前任领导人存在重大差异，从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层面带来了一定冲击。

从当前情况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对美国国内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尽管国际社会仍在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变化及其带来的外部影响，但其国内政策剧烈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例如，借助政府效率部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联邦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拜登本人及其政府高级官员进行政治清算，解雇了17名联邦检察官，削减联盟资助，导致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内的医疗卫生系统受到冲击，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布解雇2000名从事生物医药研究的人员。此外，特朗普还誓言对国防部、FBI、CIA 进行查账，并计划裁撤教育部对外援助署等诸多机构，要求国务院和环境署大幅裁剪人员，如美国对外援助署解雇了1400多名员工。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这些国内政策调整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到许多人的工作岗位、科研支持和医疗保险。

特朗普的政策剧变在国际层面也表现出显著的冲击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及其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甚至反复无常的加征关税政策方面。这些举措与以往政府及传统两党政策理念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特朗普冲击波”的独特性。但相较而言，特朗普政策在国内的冲击程度大于其在国际上的冲击，国际上受到的反制也更为明显。

有观点认为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一场革命，并主张要认识美国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的深层变化，需要一场认知范式革命和政治文化变迁上的革命性判断。然而，目前尚需进一步观察，以判断这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变化，还是一个新的长周期变化。有学者提出，从两院选举到总统大选，再到州长选举以及最高法院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格局变化，均表现为一场特朗普主义的全面胜利。可实际上从选民层面来看，特朗普获得7600万张选举人票，而哈里斯在准备不足仓促上阵的情况下也获得了7400多万张票，这表明任有大约一半的选民并不支

持特朗普。**尽管七个摇摆州在此次选举中转为红州，但从全国选民总数来看，仍有约7000多万选民没有投特朗普的票。**美国作为一个由选民决定政治大选结果的国家，民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此次选举是否能够验证美国社会思潮和政治根基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就职两个多月的执政对经济全球化终结的影响以及对联盟体系的破坏性终结也尚待明确。尽管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盟友的利益，加大了跨大西洋合作的裂缝，但期西方盟友仍纷纷前往白宫寻求沟通与协调。**欧洲领导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均积极与美国领导人互动，表明当前联盟体系并未出现瓦解迹象。**即便欧洲计划增加8000亿欧元国防开支以加强自身防务，但欧洲特种防务体系能否快速或最终取代北约仍不确定。特朗普政策引发的冲击波虽来势汹汹，但最终的实际效果及影响程度仍需时间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当前在国际立场上的调整以及国内一系列激进改革或革命举措，可能与其面临的时间压力密切相关。若不修改宪法，特朗普仅能任职一届，而其实际可操作时间仅约三年：第一年需出台政策，第二年要显现效果，第三年则将进入新一轮政治周期。因此，他必须在第一年迅速推出关键政策，时间压力急迫。然而，若其在国内改革力度过大，尽管有基本盘的选民支持，但经济下滑、大规模裁员与驱赶非法移民问题等可能加大另一半选民的强烈不满。明年的中期选举对特朗普而言是重要考验。当前国内政治清算氛围浓厚，特朗普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若在中期选举中遭到选民惩罚，必然沦为无所作为的“跛脚总统”，后续施政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他只能借助大选的当前势头，迅速推动其议程，这正是由于其面临的时间压力所致。

二、中美贸易谈判前景目前并不乐观

在国际问题中，中美贸易磋商是否有达成新交易的可能性备受关注。其关键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认知上存在不对称性。**中国主张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认为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开展贸易磋商和经贸合作。而特朗普则存在相反的认知哲学，故意制造不确定性，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不确定性来制造交易空间并获取利益。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双方在处理复杂纠纷时难以形成信任气氛，尤其在关税问题上，双方难以达成稳定的合作预期。**二是双方在谈判风格上存在差异。**中方倾向于先从工作层解决问题，再由高层确认；而特朗普更偏好通过高层直接决策，自上而下推动谈判。尽管存在多种解释，但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仍是阻碍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中形成稳定预期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交易的困难。根据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需大量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填补特朗普所要求的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之后，中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从约2000多亿美元扩大至近3000亿美元。中国面临填补这一巨额逆差的巨大困难，因为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不断扩大，导致贸易逆差难以通过正常交易弥补。这种贸易逆差的扩大以及上述双方战略认知上的不对称性，构成了中美之间达成特朗普所期望的“great deal”的巨大障碍。尽管如此，特朗普任职前后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和外交团队仍在努力进行沟通。

然而，快速解决上述两个挑战并非易事。在慕尼黑会议上，王毅未与美方国务卿会面，这可能与特朗普就职前后中美关系的开局预期变化的态势密切相关。期初中美关系似乎开局良好，特朗普甚至放言中美联手可解决世界上的所有挑战。1月17日两国领导人通电话，1月20日美国新领导人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其就职仪式。然而，2月1日美国宣布对华加征10%关税，导致2月14日王毅在慕尼黑会议上发出“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批评性讲话，表明双方在贸易经贸关系改善问题上的沟通不畅，仍需要时间或更激烈的博弈来解决分歧。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在对华一系列经贸政策进行评估，包括开展基于301调查的评估、中国执行2020年1月15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情况的评估以及对中国 USTR 地位的评估。这些评估预计需时三个月或百日并将最终得出结论。尽管特朗普多次表示双方领导人可能很快会面，但双边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及技术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目前并不乐观。

以市场角度解读“特朗普冲击波”背后逻辑及效果

陶冬 淡水泉（香港）总裁

以下观点整理自陶冬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一、市场视角下的“特朗普冲击波”影响

2024年11月5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市场无法确定“好的特朗普”还是“坏的特朗普”究竟会真正出现。若以2024年和2025年之交为分水岭，2024年最后两个月市场普遍预期“好的特朗普”将出现，因此“特朗普交易”盛行，股票、债券、美元、比特币等均呈现上涨态势。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市场预期特朗普内阁将通过提高美国经济效率、投资效率，推动去极左化、减税等政策。市场对这些预期用真金实银表示认可，市场当时普遍认为“好的特朗普”将出现。

然而，进入2025年后，市场情绪出现了转变，开始担忧“坏的特朗普”出现。具体表现为，关税战不再局限于个别国家或少数产品，而是几乎对所有盟友和贸易伙伴全面开战。美国对其前五大进口国均以不同名义加征关税，此举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被加征关税的国家纷纷采取报复措施，提高或威胁提高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马斯克在削减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方面的举措较为激进，导致大量联邦预算被删减，众多联邦雇员被停职或裁撤，这一系列措施使得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上升，PCE（个人消费支出）通胀上升，而 PCE 消费则呈现下降趋势。市场逐渐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看到美国可能再次出现滞胀局面的迹象。当然，使用“滞胀”一词需谨慎，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并非上世纪70年代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与结构性衰退的组合，但美国通货膨胀的下行速度确实在放缓，甚至出现反弹，同时美国经济发生轻微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这对美国资本市场和整体经济都不是好消息。美国股市已经跌至美国大选之前的水平，市场以实际行动对特朗普想建立的经济、民生、社会秩序以及国际贸易秩序投下了不信任票。

市场上当前还存在一种观点，即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意引导经济进入衰退。从逻辑上分析，如果美国经济在当前出现温和衰退，要比在明年中期选举前出现衰退、交易崩盘和消费大幅下滑等情况，对共和党可能更有利。此外，一旦经济出现轻微衰退，也为美联储后续降息提

供了空间，同时有助于降低美国国债的发债成本，有利于控制美国债务的无序增长。从这一角度而言，特朗普政府对当前出现一次轻微衰退或许并不特别在意。个人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大，虽然这并非必然事件，但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在下调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美国 GDP 的预测，反映出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新政引发衰退的担忧正在明显上升。

然而，尽管市场普遍认为贸易战等因素可能导致物价上涨或物价下降速度放缓，但并未预测到会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反弹。这大概是市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因此，即使出现一次轻微的经济衰退，也可能是自我诱导的结果。既然有能力引导经济衰退，那么在适当时机调整政策以重新拉动经济复苏也是可能的。

因此，当前美国实体经济出现崩盘的风险并不大，但美国资本市场由于估值过高，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产价格波动。今年美国的风险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导致市场出现螺旋式下滑的可能性大于实体经济的崩溃风险。

二、特朗普的核心理念与战略意图

海内外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难以捉摸、不可预测的人物，其战术运用的确变化多端。然而，从战略层面来看，特朗普的立场却异常稳定，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展开。所谓“MAGA”，对内而言，首先，特朗普希望彻底铲除奥巴马、拜登连续执政期间所形成的“白左”思潮，推动去极端化。其次，他意图打破美国的深层政府结构。在其第一届任期内，尽管雄心勃勃，但受到政府建制势力的制约，许多政策难以贯彻实施，甚至出现“政令不出白宫”的说法。在失去连任后，美国建制派政府又对其采取了一系列追杀式措施，使特朗普心怀恨意。第三，特朗普希望建立一个他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经济运营体系，即低税率、高关税、去监管以及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他确实在这一方向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且由于共和党同时掌控了白宫和参众两院，他在推动政策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权力，其政策推进的力度也较为迅猛。

“MAGA”在海外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彻底打破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经贸地缘政治秩序。这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特朗普认为许多国家在贸易中占了美国的便宜，导致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二是他认为部分盟国在军事开支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其二，从自身利益出发，特朗普正在全力扭转这种局面。这也是其在第二任期间不仅针对中国，而是几乎涵

盖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和军事盟友的原因。其三，在地缘政治方面，他希望尽快从乌克兰问题中脱身，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

“MAGA”在金融领域的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推动美元资产价格上涨。特朗普对金融资产，尤其是股市极为关注。在其离任时，可能会列出一份成就清单，其中美元资产价格上涨将是其中重要一项。

其二，重组美国债务。过去五六年间，美国债务负担及利率开支急剧上升，债务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同时这也开始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特朗普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实施债务重组，将美国当前所借的两年期、五年期、十年期乃至三十年期国债，尤其是那些依赖美国在贸易和军事上支持的海外国家所持有的国债，全部置换为50年期或100年期的长期国债。通过这一举措，美国将不再担忧国债市场的短期波动，实现类似于永续债的效果。债务重组是实现“MAGA”的重要步骤，因为这将有助于增强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进一步巩固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特朗普的一些举措具有可行性，而另一些则面临诸多困难。例如，他试图通过关税手段将全球产业链重新拉回美国，但这一目标面临重重挑战。一个典型例证是美国试图通过威胁与利诱，将台湾地区台积电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迁至美国亚利桑那州。然而，台积电指出，美国在某些方面难以满足其生产需求。以台湾地区发生地震为例，台积电工程师能在两小时内迅速返回办公室进行设备调试，因为芯片生产需要极度稳定和平衡的环境，一旦发生地震，整个生产流程需要重新调试。台积电向特朗普表明，在美国难以找到如此多的工程师愿意随时响应类似情况，而特朗普对此的回应是亚利桑那州没有地震。这反映出他对产业的理解以及对竞争性等问题缺乏深度洞察，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似是而非，类似情况在许多问题上均有体现。

然而，特朗普在某些领域或许仍能有所作为。就关税问题而言，其对全球征收关税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因为与其他方面相比，关税收入终究是有限的。他真正的意图是通过关税手段将产业链重新吸引回美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强大的产业链优势，使其能够大量生产航空母舰和飞机等军事装备。而如今，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已经显著削弱。

无论特朗普的意图如何，“MAGA”的进程无论是在国内政策、对外关系还是金融领域，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混乱和秩序的崩溃，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战略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尽管这一因素具有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能否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政坛的钟摆大概每几十年就会摆动一次，而特朗普主义不会随着特朗普离开白宫而消失。美国的共和党已经逐渐演变为“特朗普的共和党”，而民主党近年来则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因此，4年后总统职位可能仍由共和党掌控。当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与其当前的政策和行动密切相关。

三、对中国的启示及应对策略

从中国应对的角度，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特朗普主义长期化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的准备。这一趋势具有长期性和周期性特征，其背后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中产阶级的相对萎缩，进而导致政坛出现极端化倾向。第二，中国必须着力发展内需市场，立足自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内需。虽然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只要内需市场稳定，许多问题将更容易解决。第三，中国既要与美国保持对话，也要积极改善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是因为当前国际社会已进入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聚焦“‘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CMF专题报告发布

3月29日，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杨瑞龙、毛振华、徐奇渊、陈琪、陶冬、李巍**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历史性的对决：回溯2024年美国大选

二、特朗普“冲击波”的具体表现

三、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冲击波”

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我们必须正视特朗普背后强大而持久的社会力量，而不能再把他当做一个异数和偶然。我们观察这个“全新的”美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需要一场认知上的“范式革命”。

第二，特朗普正在成为一个“帝王式总统”，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破坏力要超过第一任期。特朗普“冲击波”正在全面凸显，这在全球层面主要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将加速走向终结，美国联盟体系加速走向瓦解，自由国际秩序加速呈现崩溃。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特朗普任内的美国将是空前的自私和不讲道德的。

第三，特朗普执政近两个月来的诸多表现，虽有代表正确方向的一面，但也呈现出相当的混乱，特朗普及其团队还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对美国进行负责任的改革，他们的一系

列行为反而正在对美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和国际领导地位构成持久而深重的伤害。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身健体。

一、历史性的对决：回溯2024年美国大选

2024年美国大选呈现出“一边倒”格局，这一判断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总统选举中，无论是选举人票还是普选票，特朗普所领导的共和党都战胜了由哈里斯领导的民主党。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执政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他未能赢得普选票，仅依靠选举人票胜出。而在2024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的胜利毫无争议，特别是在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摇摆州”，几乎全部被特朗普拿下。

其次，除了总统选举，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也取得了优势。同时，2024年还举行了州长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赢得了27个州的州长席位，民主党仅获得23席，**共和党在州长层面同样占据上风。**

最后，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席位常被公众忽视，但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大法官，其中自由派（代表民主党）法官仅有三位，保守派（代表共和党）法官则有六位。**由此可见，无论是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州政府权力，还是最高法院的权力，共和党均处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2024年美国选举的基本背景与结果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其成为一位“帝王式总统”铺平了道路。结合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特征，可以认为美国正步入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

传统上，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时代，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实质是精英之间利用制度进行彼此的相互制衡。因此，精英政治通常较为重视制度与规则。然而，在“大众政治”时代，往往会孕育出“强人”，“强人政治”的实质是利用大众力量打碎各种制度，以实现其自身意志不受限制的实施。这种转变，正是当下美国政治变化的显著表现。

我们可以基于2024年的选举结果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他和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极端，乔治·华盛顿作为大农场主，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贵族形象，代表了贵族政治和协商政治；特朗普则是在华尔街的底层商战中崛起，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流氓政治和独裁政治。

从特朗普核心内阁团队的背景来看，国务卿鲁比奥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司法部长邦迪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州，三位极为重要的内阁成员均来自佛罗里达州，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用人上的风格。同时，从年龄结构来看，“70后”与“80后”正在美国政坛中全面崛起，例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出生于1984年，国防部长海哥赛斯出生于1980年。

特朗普团队的人事结构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特朗普所任命的官员强调忠诚，具有门阀政治的特点。**他任用如此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政治人物，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在佛罗里达州长期经营，拥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第二，特朗普重视政治梯队的培养。**尽管他本人只能再任这一届总统，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完成自己的任期，更希望将其政治思想、风格与特点传承下去。特朗普可能离开政坛，但特朗普主义不会离开。**第三，团队成员普遍风格强硬，一意孤行，与特朗普个人风格一致。**

特朗普采取以上用人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贯彻其口号——“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即迎战“深层国家”。特朗普认为，在第一任期中，许多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其核心思想没有得到贯彻。他作为一名反建制派总统，遭到了建制派“深层国家”的强力阻碍。所以，他重新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深层国家”。

特朗普此次执政与上一任期相比，呈现出显著不同。上一任期的特朗普展现出强烈的草根色彩，当时美国的精英利益集团对其普遍持保留态度，基本未予以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形象也更多体现为获得大众支持的代表。而在这一任期，越来越多的精英利益集团开始转向支持特朗普，构成其政府的精英支持基础。这一基础主要由四大利益集团构成：**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代表的高科技硅谷精英群体集体性地支持特朗普；**金融-工业复合体**，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华尔街金融家与投资者，而是特指一小部分以加密货币为核心的精英利益群体；**军事-工业复合体**，众所周知，特朗普及共和党长期以来对军工业持积极态度，此次内阁中亦有多位成员来自军方，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大幅削减税收，但却增加了军费开支，显示出其与军工复合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能源-工业复合体**，特朗普当前政策强调对传统能源的支持，其背后主要是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这四大利益集团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此次执政的精英支持基础。

具体来看，目前存在一种说法，即“PayPal帮”正在参与美国的治理。二十多年前，美国一家名为PayPal的企业发明了移动支付技术，其创始人如今大多已成为特朗普政府中的重

要人物，或者没有政府职位，但其人脉渗入特朗普内阁。此外，还有以马克·安德里森为代表的支持加密货币的重要风投人士。该利益群体规模虽小，但力量强大，正在美国政坛上迅速崛起。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的离任演讲中指出，美国应当像当年警惕军工复合体崛起一样，警惕当下正在形成的科技-工业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主要包括以下四位代表性人物：埃隆·马斯克，目前执掌政府效率部，对美国行政体系正在进行革命性改革；大卫·萨克斯，被称为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现任美国PayPal科技顾问；彼得·蒂尔，虽未在政府中任职，但被认为是幕后的关键人物之一，一手栽培了美国史上最年轻副总统之一——万斯；马克·安德里森，在美国长期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

传统的硅谷和华尔街精英在政治立场上大多倾向于民主党，而这批科技与金融领域的精英新秀可被归类为右翼势力，转向支持共和党。他们主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反对民主党所倡导的“觉醒文化”**，在价值观层面，特别是社会价值观上表现出较强的保守倾向；**其二，推崇“技术加速主义”**，具备典型的“理工男”特征。例如，马斯克是技术万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坚信技术正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并能解决所有问题。

二、“特朗普冲击波”的具体表现

第一，“特朗普冲击波”在**内政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高政府效率。**该阵营的成员大多出身于企业界，他们特别强调效率，试图将治理企业的逻辑应用于政府管理之中，对提升政府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削减政府开支。**除减税政策外，特朗普政府效率部正在推进大规模的政府开支削减运动，关闭了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项目。**三是收紧移民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中下层、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打击措施趋于严厉，但对于高科技人才的移民政策仍然持开放态度。**四是复兴保守价值。**集中体现在迎战“DEI运动”（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和与LGBTQ+相关的“觉醒运动”。

特朗普新指定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要负责财政与预算管理，该负责人公开表示，必须解决“觉醒运动”及武器化的官僚问题，强调应由总统控制行政部门的运作。所以，美国国内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于重新确立总统对行政权力的掌控，削弱建制派的“深层政府”对国家治理的控制。同时，还要解决近年来泛滥的“觉醒运动”和“DEI运动”。

“特朗普冲击波”在国内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一个核心大战略，即复兴制造业。当前，美国政治生态高度极化，尤其在过去十年间，许多问题上呈现出“非黑即白”的投票模式，凡是民主党支持的，共和党通常反对；凡是民主党反对的，共和党则大力支持。但在这种极化格局中，仍然存在两个基本共识：其一，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二，复兴国内制造业。特朗普再次上任后，可以预见其将继续大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

制造业复兴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并成为两党基本共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战略精英都深刻认识到，美国正陷入一种“金融诅咒”。自1890年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构成了20世纪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实力基础。然而，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以上。美国担忧若这一趋势持续，其全球霸权地位将可能被中国削弱和取代。

基于这一战略共识，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坚定发展传统能源**，不再相信所谓“气候变化”；**放松金融与科技监管**，全面打响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领域与中国的新一轮科技竞争；**降低企业所得税，从21%降为15%**，为了实现制造业复兴，必须通过减税招商引资，“15%”是一个临界值，源于G20成员国曾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为防止主体间的恶性竞争，各国承诺企业所得税不得低于15%；**大力支持军工业发展**，军工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德国与日本曾一度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军工业支撑，最终遭遇发展瓶颈，特朗普此次上任后，也迎合军工复合体的要求，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军工业的发展。

“特朗普冲击波”在国际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关税冲击波”。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有大量关于关税的设想尚未得以全面实施。此次重新上台后，特朗普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举措，便是推出一套更为全面、涵盖更多贸易伙伴、更多产业，且密度更高、手段更为激进的关税政策。2025年2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关税措施。预计至4月1日，美国在对整体贸易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估之后，可能还会出台更加正式且广泛的关税政策。所以，关税政策已成为特朗普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并维持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而这一体系很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被彻底颠覆。除了关税壁垒，特朗普还致力于吸引外资，延续前财政部长耶伦所推动的近岸外包和回岸生产等一系列产业战略，旨在服务于复兴国内制造业的战略方向。

除“星际之门”计划外，苹果与台积电等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先后作出在美投资的承诺。苹果承诺将在美国本土投资5000亿美元，作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无工厂”企业之一，主要负责产品设计，甚至不直接参与组装，其核心产业链高度依赖东亚地区。此次，苹果在特朗普上任后为响应其战略方向，作出在美投资的承诺，尽管该承诺最终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但支持态度已经明确。此外，台积电也宣布将进一步追加在美国本土的1000亿美元投资，呼应特朗普提出的制造业复兴战略。

特朗普将继续捍卫美国霸权，但最终奉行何种货币政策目前难以明确判断。理论上，为了促进美国本土投资、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特朗普应采取一定程度的美元贬值政策，但美元贬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对美元霸权极为重视，坚决反对金砖国家的“去美元化”措施。对于如何在维护本土制造业的同时，又维护美元霸权，特朗普尚未提出明确或系统的政策思路，其执政团队似乎也尚未就此问题达成清晰共识。纵观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通常难以兼得，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取舍关系。例如，英国在19世纪逐步确立英镑霸权地位之后，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美国的发展轨迹也呈现出类似特征。**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的并存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将成为特朗普执政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美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核心精神来源于罗伯特·莱特希泽，他被视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精神教父”。虽然莱特希泽并未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中任职，但其政治思想的继承者目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有一句颇具影响力的名言：“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它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这一观点对美国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裔经济学家张夏准曾著有《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提出了“富国陷阱”的概念，指出发达国家在达到发达水平后，往往会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国家达到同样的水平。“踢掉梯子”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会采取保护幼稚产业、侵犯专利和商标权等措施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一旦成为发达国家后，则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和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从而阻止其他国家通过类似手段达到同样的水平。基于上述理论，美国若希望重新成为生产大国，就必须摆脱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结构，回归以生产为本的战略路径。

罗伯特·莱特希泽的思想源于个人经历，他成长于俄亥俄州，认为铁锈地带的困境源自于日本的产业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中国入世和毒品问题。同时，他是美日贸

易战和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操盘手，其幕僚长格雷尔接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支持战略性脱钩。所以，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总进口中的占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逐渐被加拿大和墨西哥所取代，中美经贸关系正朝着“脱钩”方向发展。如果特朗普目前对中国的关税水平达到40%，未来甚至可能进一步上调至60%。一旦“60%关税”成为常态或长期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可能只是“程度”问题。

特朗普的“外交冲击波”在多个方向上均有体现。在**欧洲方向**，特朗普致力于停止俄乌战争，美俄关系开始出现靠近趋势。关于美俄走向接近的原因较为复杂，可能因素包括：一是双方存在某些共同的保守社会价值观；二是两国都推崇“丛林政策”与“强人政治”；三是特朗普曾在其早年获得来自东欧资本的支持等。此外，美欧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欧洲开始进一步强化“战略自主”。长期以来，欧洲被视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军事上的侏儒”，但此次欧洲承诺投入6000亿欧元进行再武装，这一举措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究竟是走向全面战略自主，还是继续依赖美国、熬过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对此，欧洲内部存在分歧。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欧洲历次一体化几乎都是在危机推动下实现的。此次能否借助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危机，在军事、政治与财政一体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仍有待观察。

在**印太方向**，美国将继续从日本和韩国盟友中获取战略利益。同时，美印关系也有可能进一步升温。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再度上任后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

在**全球治理方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无疑将继续陷入瘫痪，甚至有走向解体的可能。特朗普已公开宣称拒绝向WTO缴纳会费，美国以往尚未出现拒缴WTO费用的先例，此次则明确表达了拒绝承担WTO相关责任与义务的立场。气变协议走向夭折，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

在**中东方向**，美国大概率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派，并对沙特施压以获取额外利益。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从“霸权心态”向“弱者心态”的转变。他既不愿再为维护国际正义承担责任，也并不在意虚妄的战略利益。特朗普曾提出，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对我们都是不公平的。

在对华问题上，特朗普的核心手段仍然是关税。虽然其关税政策面向全球，但重点对象仍是中国。在特朗普重新上任后，美国已对中国实施了两轮关税加征，当前对华商品的平均

关税接近40%。接下来，特朗普可能将兑现竞选期间的承诺，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

除商品关税外，美国还计划对中国的船运加征关税。众所周知，美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马汉的“海权论”，长期以来，美国是一个海洋强国。但美国认为在海洋领域的主导地位正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美国造船业明显衰退和在全球海上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拟对中国制造的船只、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船队中中国制造船只占比超过25%的运营商征收费用。收费标准为单次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最高收费150万美元；根据船队中中国船只的比例，收费从5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不等。

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之间的海上博弈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中一个焦点是巴拿马运河的博弈。2025年3月17日，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宣布，在特朗普政府的授权下，已正式开始对全球海运关键通道进行专项审查。根据美国法律，该委员会将形成一份审查报告，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此次收费措施仅仅只是初期试探行为，未来在海上特别是涉及关键海峡与航道中，双方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根据联邦海事委员会的行政令，将系统性重点调查全球七大海峡和航道，分别是：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巴拿马运河、北极航道。这些航道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大宗商品运输，直接影响国际供应链稳定。这是继关税之后，对中国外贸构成的第二大冲击和风险。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全球绝大多数的对外贸易依赖于海上贸易。因此，这一趋势值得未来持续观察与深入研究。

近期，美方还对中国展开新一轮制裁，美国商务部将54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在技术领域的制裁不仅不会停止，反而将进一步升级。

三、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冲击波”

面对当前这一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应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第一，减少对美国的过度关注，避免被其牵着鼻子走。目前，特朗普所采取的许多举措，实际上是在“自废武功”。**我们应按照自身的节奏推进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将发展自身作为首要任务，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正如外交部长王毅同志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引用的一首诗：“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面对强悍和霸道的对手，我们不应被其牵制，应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中美博弈的胜负关键并不在于双方本身，而在于能否争取第三方的支持。我们应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在当前中美竞争格局中，谁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到更多的第三方支持，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因此，我们应将更多的战略精力投入到第三方合作与国际伙伴关系的拓展中。

第三，着力启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这已成为我国当前紧迫的战略任务。过去，我国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美欧市场，但未来美国市场将不再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产品可能很难再进入美国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调整思路，充分激活和利用我国14亿人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超大规模市场。

此外，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外部“脱钩”压力。这一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推进。过去两年，我国在最成功的开放政策之一是对除美国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施单边免签政策。该政策收效显著，取得了良好国际反响，今后，我们要多采取类似的政策。

最后，通过持续扩大开放、激活国内市场，增强中国对全球商业力量的“磁力效应”。具体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超大市场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基础设施的磁力效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理工科人才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理工科人才储备；**产业生态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生态；**社会秩序的磁力效应**，中国整体社会秩序保持稳定，相较之下，当前西方国家在移民等问题的影响下，国内社会秩序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正是由于上述多方面优势，使得中国如同一块“吸铁石”，具备吸引全球商业资源的能力。只要我们持续发挥中国的磁力效应，美国若试图与中国“脱钩”，最终被孤立的将是美国自身。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特朗普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而非国际问题。**近年来，美国政治由“钟摆式”转为“极化式”变动，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价值观和政策方向上的分歧日益激烈。特朗普凭借民意基础再次上台，但其能否真正整合国内利益、推动再工业化，仍有待观察。在国际层面，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策略是增强自身实力、削弱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是特朗普的明确主张**，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变化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考量，他试图结束欧洲纷争以集中资源应对中国。

特朗普执政倾向于孤立主义，并可能继续退出国际组织，重塑盟国关系结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应秉持“做好自己的事”原则，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主动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争取和平发展环境，避免与美国的激烈冲突，但也要展示出我们的韧性、理性和正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陈琪**认为，“特朗普冲击波”可理解为特朗普政策的特殊性，即其政策议程或理念中与他人不同的部分。**从当前情况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对美国国内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尽管国际社会仍在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变化及其带来的外部影响，但其国内政策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在国际问题中，中美贸易问题当前备受关注。其关键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认知上存在不对称性**，中国主张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认为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解决贸易纠纷并开展合作；而特朗普则采取相反策略，故意制造不确定性，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达成交易并获取利益。**二是双方在谈判风格上存在差异。**中方倾向于先从工作层面解决问题，再由高层确认；而特朗普更偏好通过高层直接决策，自上而下推动谈判。此外，**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存在达成交易的困难**，根据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需大量购买美国产品以填补特朗普所要求的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不断扩大，导致贸易逆差难以通过正常交易弥补。

淡水泉（香港）总裁**陶冬**指出，海内外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难以捉摸、不可预测的人物，其战术运用的确变化多端。然而，从战略层面来看，特朗普的立场却异常稳定，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展开。所谓“MAGA”，对内而言，首先，特朗普希望彻底铲除奥巴马、拜登连续执政期间所形成的“白左”思潮，推动去极端化。其次，他意图打破美国的深层政府结构。第三，特朗普希望建立一个他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经济运营体系，即低税率、高关税、去监管以及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

“MAGA”在海外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彻底打破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经贸地缘政治秩序。其二，从自身利益出发，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局面。其三，在地缘政治方面，他希望尽快从乌克兰问题中脱身，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

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基于此，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特朗普主义长期化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的准备；着力发展内需市场，立足自身；要与美国保持对话，也要积极改善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徐奇渊**从党的三大法宝出发，分析如何应对“特朗普2.0冲击”。其中，党的三大法宝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首要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当前的“斗争”应以合作为最终目标，通过“斗争”寻求合作，这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三，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处理好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则**，具体来看，我国在应对贸易摩擦时采取了“扭抱缠斗”的策略。

我国应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国内拓展至国外，将第三方国家中能够团结的力量纳入其中。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但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经济冲突。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更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重要切入点。如果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净进口市场，向全世界提供需求，那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将从竞争转变为互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特朗普一系列政策安排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是特殊事件，美国曾经历过五次关税浪潮，其规模与影响不亚于当前“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美国对关税的理解和运用与我国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来分析其对关税的战略认识与政策逻辑。从历史梳理中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一是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二是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此次“特朗普2.0”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文化并不像当前某些舆论所宣扬的那样，对“关税战”普遍持反感态度。第二，在“关税战”的推进过程中，美国的内部政治分裂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第三，当前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呈现“脱实向虚”特征，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所以，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停留

在“就关税谈关税”的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所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

历史维度下的“特朗普关税冲击”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大幅度提升关税、放松管制、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实现美国再工业化与美国再强大的目标。这一系列的政策操作超越了大部分人所能理解范围，但如果从美国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关税冲击是否属于特殊事件呢？是否仅是特朗普个人特立独行之举，缺乏历史基础与文化积淀呢？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非首次。**纵观历史，美国曾经历过五次关税浪潮，很多次的关税冲击的规模与影响并不亚于当前“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

一、美国五次关税浪潮

关税在美国建国历史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英国对殖民地的高额征税政策，如《印花税法案》和《汤森德法案》。在美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核心来源就是关税。**因此，关税文化在美国联邦体系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第一，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1861年国会通过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莫里尔关税法案》，并对工业化进程寄予了高度期待，希望通过征收关税以推动美国北方的工业化发展，但这一举措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历史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南北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因为废奴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在关税政策上的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代表北方工业化体系的利益集团主张实行高关税，以扩大国内市场并推进本土工业发展；而南方的经济命脉是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庄园主群体则主张低关税，倾向于将棉花大规模出口至英、法等欧洲国家，并进口纺织品。南北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关税政策密切相关。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关税始终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关税是美国擅长运用的政策工具，但也曾在历史上引发严重的国内分裂。

第二，在南北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镀金时代”之后，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以推行高关税著称。1890 年，时任国会议员的他提出《麦金莱关税法案》，将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提高到49.5%。1897年，麦金莱作为总统支持通过了《丁利关税法案》。这些法案均以征收高额

关税为核心内容，核心目标是通过高关税政策加速推进美国工业化进程，使美国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在1890年至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美国的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一成果被认为是麦金莱关税政策推动下的重要产物，也正因如此，麦金莱成为特朗普最为敬仰的美国总统之一。特朗普从1890年代的关税政策中得出结论，关税是一项“好工具”，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工业化。但是，美国工业化是自身发展的产物还是关税促推的产物依然是一个历史难以澄清的课题。

第三，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将当时的大萧条归因于外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因此期望通过征收高额关税以重整国内市场、重建美国工业体系，摆脱经济危机。所以，该法案的核心措施是对其他国家商品征收高关税。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法案，出台后遭到世界各国的全面反制，不仅没有挽救美国经济的萧条局面，反而使美国经济在各国的反制下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因此，《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关税负面作用的典型案例。

第四，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尼克松冲击”。这一事件在很多方面与“特朗普冲击波”具有相似特征。“尼克松冲击”的主要内容包括：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原本对世界各国美元持有者的黄金债务一笔勾销；对美国所有涉税进口品临时（90天）征收10%的附加税。“尼克松冲击”之后，各国于1971年底签订了《史密森协定》，将美元对黄金贬值7.89%，同时将美元较主要货币贬值10%。由此可见，“尼克松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五，1985年美国与日本爆发贸易冲突，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求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及自愿扩大进口，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同时推动美元贬值，日元大幅升值。这就是导致日本失去30年的核心诱因之一的著名的**“广场协议”**。

综上所述，美国在历史上多次主动采取关税或类似干预政策，这并非偶然现象。**美国对关税的理解和运用与我国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来分析其对关税的战略认识与政策逻辑。**

二、美国关税政策与再工业化的历史结论

从以上历史梳理中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第一，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主义极力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关税，而杰克逊主义则反对关税。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支持关税政策，而南方则持反对态度。1890年麦金莱政府时期亦是如此，共和党主张征收高关税，而民主党持相反立场。大规模的关税战一方面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分裂有关。因此，美国关税政策的持续性往往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分裂的情况。关税政策的推行与某些关键历史人物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例如麦金莱最终遭到刺杀；胡佛因大萧条而败选；面对国会的弹劾压力，尼克松在众议院就弹劾条款投票前夕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第二，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超越工业化阶段的美国无法实施“再工业化”。美国在1860年左右及1890年左右推行的一系列关税政策对早期工业化和加速工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政策效应仅在美国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加速发展阶段时才得以体现。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在胡佛时代，美国工业体系在大萧条中遭受严重打击；在尼克松时期，尤其是《牙买加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在与德国的汽车工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在广场协议之后，里根政府的7大产业再工业化也以失败告终。

三、应对“特朗普冲击波”的历史启示

对于此次“特朗普2.0”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文化并不像当前某些舆论所宣扬的那样，对“关税战”普遍持反感态度。**事实上，在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中，美国非常擅长将关税作为工具服务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及各类政策目标。

第二，在“关税战”的推进过程中，美国的内部政治分裂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这种趋势可以从历史中多次印证，例如，汉密尔顿主义作为早期主张关税政策的重要思想，其代表人物汉密尔顿最终死于决斗；1860年前后的关税政策成为南北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麦金莱关税法》和《丁利法案》在推动高关税政策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麦金莱遇刺身亡。所以，关税在某种程度上既是美国内部分裂的产物，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分裂局势的加剧。**因此，能否顺利推进特朗普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通过“再工业化”整合美国的国内利益。但从目前来看，这一点难以实现。**

第三，美国再工业化之后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都难以破解“再工业化难题”。当前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呈现“脱实向虚”特征，导致美国难以实现工业技术的重新商业化和体系化。即便政府采取财政补贴、“大棒+胡萝卜”等政策，也很难真正重塑制造业竞争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制造业仍难以与中国的产业体系进行抗衡，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实现。新特里芬难题决定了美国在美元超级储备体系中必定陷入空心化和债务化的泥潭，美国难以寻找“金融控制力”与“产业竞争力”相互协调的新路径，特朗普2.0不仅难以有真正自洽的哲学理论基础，同时也没有可行的行政实施路径。**

因此，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停留在“就关税谈关税”的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所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在这种结构性变化和整体性变化中，包括一系列值得重点关注的参数：（1）美国股票市场短期波动是否将引发美国国债市场价格的波动，进一步引发美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2）美国在近期贸易战、关税战过程中，经济会不会出现加速萧条？（3）当前多重冲突背景下，美国是否将面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压力？（4）在现有的内部减税与外部加关税的政策组合下，美国能否有效缓解财政赤字与债务危机？（5）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遭遇滑铁卢事件？

冷静应对“特朗普冲击波”，做好自己的事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101 期）上的发言

在美国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约束下，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执政背后是美国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最基础的民意，理解这一基本逻辑，对于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特朗普冲击波”是十分重要的。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由盟国政治转向孤立主义，美国优先原则下，强大自己的同时也在着力削弱竞争对手，甚至企图向全球征税以改变自认为的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后续，预计特朗普可能会推动竞选时期提出的“向中国征收 60%以上的关税”等措施落地。但不管特朗普的非理性政策落地与否，我们都应该冷静应对这一挑战，做好自己的事的同时，主动积极处理我们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积累筹码，以取得决战的最终胜利。

一、特朗普再次上台的背后是美国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最基础的民意

在美国的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约束下，特朗普再次上台本质上是两党博弈的最终结果。美国是两党制，两党的政治观点在很多方面是截然对立的。过去这些政治观点会类似于钟摆左右变化，但变化幅度有限，并且出现问题能迅速调整，所以在执政优势和资源的支撑下，过去美国大多数总统都能够连任。但是，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把美国的政策推到了向右的极端，之后在拜登总统任期内，民主党又迅速左倾，且幅度更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钟摆频率变高、幅度加大，而且都突破了原来的政策边框，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在两党博弈下，民意依旧是决定谁能执政的重要因素，本次美国大选也不例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特朗普上台执政就会破坏美国历经 250 年发展所奠定的政治基础与基本制度，进而使美国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甚至将其拖垮，应该充分认识到，美国国内政治才是决定特朗普能不能干、有没有权力干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再次上台有多重因素支撑，民意是取胜的关键性因素。特朗普本次上台拿到了所有摇摆州的选票，创造了历史，背后既有资本的转向，以及特朗普在中枪之后的表现等因素，但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美国国内民意的支持。虽然在我们这些外国观察者看来，特朗普的某些政策对现有规则形成了挑战，但实际上，特朗普的政策在美国国内民意较高，美国国内

并不觉得特朗普的政策是鲁莽之举。往后看，特朗普上台后着力培养 80 后作为共和党的下一代接班人，这一代接班人能否顺利接班，依然取决于美国国内民意，这既包括诸多带有美国国内浓厚的价值观的因素，例如堕胎、拥枪和传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拜登政府未能实现连任与美国国内高通胀预期密切相关。所以特朗普上任后在短时间内出台了大量引人瞩目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国内经济，积极向选民兑现承诺，以巩固民意。

二、孤立主义倾向下，美国着力削弱竞争对手、退群不主战

传统上，美国国际政治的核心是盟国政治，这一策略在过往的实践中帮助美国实现了诸多战略目标，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特朗普可能认为，在当前世界博弈格局下，这一策略存在由优势转化为负担的可能性，因此，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显示出孤立主义倾向，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本次特朗普上台依然延续了这一提法。特朗普认为，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方面是要提升美国自身实力，包括制造业回流、维护美元霸权等，夯实“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要削弱竞争对手，甚至演变为即使会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一定损害，也要通过一些非理性政策损害其他国家经济，这种“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错误思维给全球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削弱竞争对手是美国实施孤立主义的重要战略。我们要观察美国会把哪些国家作为主要竞争对手。首先，特朗普在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启了与中国敌对性的全面竞争，这是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再次上台后特朗普也会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对于俄罗斯，特朗普并不认为俄罗斯足以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更倾向于采取一系列手段稳住俄罗斯，避免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造成过大的冲击与干扰。对于欧洲，虽然欧洲推出了欧元，对美元霸权形成了一定冲击，但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国家之间的矛盾较多，欧元并没有真正起到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作用，因此欧洲是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潜在竞争对手也值得讨论。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对中、俄、欧采取了不同的战术。美国现在急于结束俄乌战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的真实目的可能在于，一方面要全力应对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大幅恶化，还在经济总量上对美国形成挑战，因此美国想从欧洲抽身，将战略重心聚焦中国。另一方面则是要让欧洲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美国认为，欧洲大量的财政资金都用来支撑其高福利体系，但军事责任却由美国来“买单”，俄乌战争

中美国承担了较高的军事援助费用，美国对此较为不满，希望能够让欧洲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和经济成本。但美国战略收缩后还能否继续维持美元霸权，以及欧美之间的经济利益如何分配，供应链依赖如何解决，都还需进一步讨论和考量。对于俄罗斯，美国认为现在的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中、美构成三角博弈，反而是企图让俄罗斯重回西方体系，将 G7 重新拓展回 G8，扩大美国联盟战线。

差异化的战术与孤立主义倾向对国际秩序产生冲击，美国“退群”但不“主战”。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出现之后，特朗普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甚至还威胁退出联合国。但在对外战争上，除了特朗普支持以色列这一政策比较特殊以外，其他方面特朗普并不倾向于引发战争冲突。尽管美国挑起了与巴拿马、加拿大和墨西哥、格陵兰岛等一系列纷争，但并不希望其演化成敌对态势，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美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会单纯地因为关税等问题就崩盘，它们本质上仍然是美国的盟国。

三、冷静应对，做好自己的事与处理好外部关系两条腿走路

尽管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政治基础和历史渊源，但最终是否会回归孤立主义有待观察和分析。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例一度高达 77%，尽管现在下滑至 65%，但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的背景下，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对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构成威胁，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2018 年访美后，通过与美国学者的交流，我认为美国对华将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与盟国一起与中国展开全面冷战。但当时美国与盟国关系不佳，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拜登奉行盟国政治，上台后即着手修复与盟国的关系，尽管美国的“脱钩”最后变成欧洲提出的“去风险”，但本质上是加强与欧盟的一致性来对抗中国。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升级与中国的贸易战，脱钩方式或将发生变化。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进一步升级了中美贸易战，连续两次加征关税，后续可能进一步加征关税，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 60%，甚至 70%以上，同时还要警惕特朗普提出的“去中国化”等极端措施落地。与拜登不同的是，特朗普基本不会考虑与盟国的相关安排，而是选择单方面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脱钩是否还会沿着原来的方式进行值得讨论。另外，传统上认为，特朗普的利益诉求集中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不理性地提高关税税率就基本相当于放弃经贸关

系，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获取哪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取这些利益，特朗普能够承受多高的成本？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冷静看待“特朗普 2.0”对中国的影响，着力做好自己的事，并积极处理好国际关系，为中国发展争取时间。特朗普对美国发展的布局无法在其四年任期内完成，那么四年之后美国的民意如何，特朗普及其目前的 80 后团队在四年后是否依旧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些都需要观察。与之相比，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更加重要。**一方面应该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当前要努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加速自身发展，避免与美国的直接正面冲突，这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利益。**我认为今年以来美国两次加征关税后我们的反应非常有智慧，第一次加征关税后，我们凭借准确的预判，在五天后即出台了应对措施，第二次加征关税后，我们没有仓促应战，作为全球贸易大国，我们手上有足够的筹码，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应该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向世界表示友好的姿态。**当前，我们与日、韩的合作加速回暖，与欧洲的关系也正在改善，我们要认真处理国际关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

总体来说，我们要客观看待特朗普再次上台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要冷静应对，提前做好特朗普后续进一步采取非理性行动的准备，并做好自己的事，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尽量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或把与美国最终决战的时间往后延，这样在最终决战到来时我们才更有筹码。我们不缺乏战斗性，但不应着眼于显示战斗姿态，取得战斗的最终胜利才是我们的目标。

以党的三大法宝来应对“特朗普2.0冲击”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徐奇渊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如同打台球时大力出奇迹，特朗普2.0的冲击带来了诸多变数。在此过程中，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自特朗普1.0开启的贸易战，至今已满7年，如今我们正面临特朗普2.0阶段。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总结过去7年的经验。实际上，党的百年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经验，这对于总结过去的7年、更好应对当前外部冲击，也是很好的历史借鉴。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历史上的第三份重要决议。这份决议再次强调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三大法宝。**三大法宝包括：党的建设；敢于斗争**；扩大**统一战线。其中第二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的是武装斗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则更多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其形式和对应主体随着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时期转变而发生了变化。这三大法宝，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实践反复得到验证的宝贵经验。**党的建设，实际上对应于把自己的事做好。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主要对应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处理。扩大统一战线，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把朋友做得多多的。**下面借鉴这三个角度，来谈一谈如何应对新的外部冲击。

一、党的建设：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于党来说，党的建设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阵脚要稳。在当前国际形势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首先也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回顾过去7年，美国两届政府的关税、制裁政策都直接指向中国的制造业。其他也有投资、金融方面的政策，但实际上最终也指向制造业。但是在过去的7年中，中国的制造业表现强劲。不论是出口份额，还是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提升，甚至招致了“产能过剩”的批评和担忧。同时，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领域，中国近年来也取得了快速突破，进展很快。总体而言，美国针对中国制造业所采取的限制发展措施并未取得成功。可以说，仅仅从制造业领域来看，过去7年我们成功应对了美国的压力。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确实面临一些压力，尤其是近年来内需不足的挑战突出。这也比较好理解，比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对经济增速形成了拖累。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关注服务业，事实上，在前面提到制造业表现强劲的背景下，我国的服务业发展面临一定的停滞。在过去7年中，特别是过去的4、5年中，制造业、服务业部分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反差。总体而言，从过去7年来看，我们很好应对了外部冲击对制造业可能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制造业发展得相当好），但是国内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系统性问题更加突出了。

除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关系需要更好的平衡，外需和内需的关系也要更好的平衡。2024年，净外需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30%、拉动增长1.5个百分点。回忆2020年，中央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点内容，就是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降低外需的依赖，让国民经济循环更多依托于内需。但是过去7年间，我们对外需的依赖仍然较高。现在沃尔玛、COSCO 向中国企业施压降价，试想：如果现在我们的内需强劲，PPI 不是处于负值、而是处于正值区间，中国企业在面对压价时就会更有谈判能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全面扩大内需置于首位，而且特别强调扩大内需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工作。

中国发展空间巨大，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大有可为。当前，我国人均 GDP 约为在1.3万美元左右，美国是8万多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6到1/7。差距大是压力也是空间，尽管我国在技术突破方面暂时面临一些瓶颈和障碍，但是也要看到，除了科技领域之外，我国在诸多领域都存在大幅改善提升的空间，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政府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等等。只要在某个关键领域中实现重大突破，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就将进一步打开，与美国的差距也将明显缩小。只要我国人均 GDP 仅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就可以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越。因此，在高度关注科技力量对比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内的结构性与系统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信心，将发展重点聚焦于国内，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经济健康发展，在中美双边关系上我们的底气就更足了。因此，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我们要有系统性的思维，平衡好应对外部冲击和国内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扭抱缠斗

在中美双边关系的诸多领域我们都面临着斗争的压力，在关键时候必须应招、出招，这要求我们必须敢于斗争。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善于斗争。当前，美国有一部分人主张中美经济

关系应该脱钩，持有这种极端观点的人往往对华态度最不友好。他们恰恰最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对中国加关税，中国全面反制，然后冲突失控、无限升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强调善于斗争，避免陷入对方设定的思维框架，避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具体来说，善于斗争要求我们努力做到扭抱缠斗：

一是反制要精准有力。例如在2024年5月，拜登政府对中国价值2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我国的反击措施就可以概括为精准有力。尽管回击的金额并非完全对等，但注重打击对方的痛点。例如，将美国相关企业纳入实体清单，或者针对特定农产品进行精准打击。二是在精准反制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发展双边的贸易、投资联系。三是扭抱缠斗的策略也要升级。如果说扭抱缠斗1.0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直接绑定，那么通过第三方国家来实现中美关系的间接绑定就是扭抱缠斗2.0。中国和所有非美国家都有紧密的经济联系，那么美国也难以摆脱与中国的间接经济联系。

三、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我们需要把统一战线从国内拓展至国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但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经济冲突。后者并不是根本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改善的。有个数据我们要注意，来自 WTO：我国所遭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只有34%来自美国，而接近三分之二的措施则来自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巴西、印度、东盟国家等，甚至包括巴基斯坦。

非美国家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原因值得思考。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我国与160个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中，对120个贸易伙伴表现为顺差。我们最近与欧洲同事交流，他们提到，汽车是欧洲的支柱产业，其中德国有800万汽车产业工人，如果这个产业在未来失去竞争力，就业形势将极为严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经济压力很大，在过去这些年的科技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形势之下，感觉到沮丧、焦虑。因此对于这些第三方国家，我们应当换位思考，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开放格局，平衡才更加可持续；同时还要致力于塑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格局。

四、从三个层面来看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实际上，扩大内需战略也关系到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所以，还是回到最前面讲的扩大内需。我们要从三个层面来认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第一个层面，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政策，是逆周期调节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点，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眼点。中国应将总需求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依赖内需，而非过度依赖外需。事实上，美国作为典型的超大型经济体，其经济循环也主要依赖国内需求。因此，扩大内需不仅是一项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它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期任务。

第三个层面，扩大内需也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关键。如果中国能够更多进口，甚至向全世界提供净需求，那么中国与很多经济体的关系将从更多竞争转变为更加互补。我们看到，全球有三大经济区：一是欧盟，其内部贸易占全部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二是北美，美墨加三国经济联系紧密，加拿大、墨西哥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经济凝聚力也很强，美国是核心。三是东亚地区，这个地区的内部贸易比例较低，我这里的数据比较旧，只有40%多。现在东亚地区的国家主要仍是出口导向，都很依赖对欧美的出口，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很明显。在这种竞争格局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时，其他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可以更多出口到美国。这种经济基础，必然导致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凝聚力较弱，而离心力较强——虽然中国是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最后，回到三个法宝的角度：其一，扩大内需是当前做好自己事情的最直接体现。其二，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越成功，我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斗争地位就越主动、就越有利。其三，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也应当全方位扩大内需，与第三方国家实现更加平衡的经贸关系，这也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关键点。

“特朗普冲击波”与中美贸易难点分析

陈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陈琪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一、特朗普政策的冲击性

“特朗普冲击波”可理解为特朗普政策的特殊性，即其政策议程或理念中与前任不同的部分。无论是其政策理念方向，还是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措施，均与前任领导人存在重大差异，从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层面带来了一定冲击。

从当前情况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对美国国内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尽管国际社会仍在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变化及其带来的外部影响，但其国内政策剧烈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例如，借助政府效率部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联邦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拜登本人及其政府高级官员进行政治清算，解雇了17名联邦检察官，削减联盟资助，导致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内的医疗卫生系统受到冲击，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布解雇2000名从事生物医药研究的人员。此外，特朗普还誓言对国防部、FBI、CIA 进行查账，并计划裁撤教育部对外援助署等诸多机构，要求国务院和环境署大幅裁剪人员，如美国对外援助署解雇了1400多名员工。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这些国内政策调整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到许多人的工作岗位、科研支持和医疗保险。

特朗普的政策剧变在国际层面也表现出显著的冲击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及其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甚至反复无常的加征关税政策方面。这些举措与以往政府及传统两党政策理念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特朗普冲击波”的独特性。但相较而言，特朗普政策在国内的冲击程度大于其在国际上的冲击，国际上受到的反制也更为明显。

有观点认为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一场革命，并主张要认识美国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的深层变化，需要一场认知范式革命和政治文化变迁上的革命性判断。然而，目前尚需进一步观察，以判断这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变化，还是一个新的长周期变化。有学者提出，从两院选举到总统大选，再到州长选举以及最高法院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格局变化，均表现为一场特朗普主义的全面胜利。可实际上从选民层面来看，特朗普获得7600万张选举人票，而哈里斯在准备不足仓促上阵的情况下也获得了7400多万张票，这表明任有大约一半的选民并不支

持特朗普。**尽管七个摇摆州在此次选举中转为红州，但从全国选民总数来看，仍有约7000多万选民没有投特朗普的票。**美国作为一个由选民决定政治大选结果的国家，民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此次选举是否能够验证美国社会思潮和政治根基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就职两个多月的执政对经济全球化终结的影响以及对联盟体系的破坏性终结也尚待明确。尽管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盟友的利益，加大了跨大西洋合作的裂缝，但期西方盟友仍纷纷前往白宫寻求沟通与协调。**欧洲领导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均积极与美国领导人互动，表明当前联盟体系并未出现瓦解迹象。**即便欧洲计划增加8000亿欧元国防开支以加强自身防务，但欧洲特种防务体系能否快速或最终取代北约仍不确定。特朗普政策引发的冲击波虽来势汹汹，但最终的实际效果及影响程度仍需时间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当前在国际立场上的调整以及国内一系列激进改革或革命举措，可能与其面临的时间压力密切相关。若不修改宪法，特朗普仅能任职一届，而其实际可操作时间仅约三年：第一年需出台政策，第二年要显现效果，第三年则将进入新一轮政治周期。因此，他必须在第一年迅速推出关键政策，时间压力急迫。然而，若其在国内改革力度过大，尽管有基本盘的选民支持，但经济下滑、大规模裁员与驱赶非法移民问题等可能加大另一半选民的强烈不满。明年的中期选举对特朗普而言是重要考验。当前国内政治清算氛围浓厚，特朗普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若在中期选举中遭到选民惩罚，必然沦为无所作为的“跛脚总统”，后续施政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他只能借助大选的当前势头，迅速推动其议程，这正是由于其面临的时间压力所致。

二、中美贸易谈判前景目前并不乐观

在国际问题中，中美贸易磋商是否有达成新交易的可能性备受关注。其关键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认知上存在不对称性。**中国主张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认为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开展贸易磋商和经贸合作。而特朗普则存在相反的认知哲学，故意制造不确定性，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不确定性来制造交易空间并获取利益。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双方在处理复杂纠纷时难以形成信任气氛，尤其在关税问题上，双方难以达成稳定的合作预期。**二是双方在谈判风格上存在差异。**中方倾向于先从工作层解决问题，再由高层确认；而特朗普更偏好通过高层直接决策，自上而下推动谈判。尽管存在多种解释，但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仍是阻碍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中形成稳定预期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交易的困难。根据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需大量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填补特朗普所要求的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之后，中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从约2000多亿美元扩大至近3000亿美元。中国面临填补这一巨额逆差的巨大困难，因为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不断扩大，导致贸易逆差难以通过正常交易弥补。这种贸易逆差的扩大以及上述双方战略认知上的不对称性，构成了中美之间达成特朗普所期望的“great deal”的巨大障碍。尽管如此，特朗普任职前后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和外交团队仍在努力进行沟通。

然而，快速解决上述两个挑战并非易事。在慕尼黑会议上，王毅未与美方国务卿会面，这可能与特朗普就职前后中美关系的开局预期变化的态势密切相关。期初中美关系似乎开局良好，特朗普甚至放言中美联手可解决世界上的所有挑战。1月17日两国领导人通电话，1月20日美国新领导人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其就职仪式。然而，2月1日美国宣布对华加征10%关税，导致2月14日王毅在慕尼黑会议上发出“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批评性讲话，表明双方在贸易经贸关系改善问题上的沟通不畅，仍需要时间或更激烈的博弈来解决分歧。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在对华一系列经贸政策进行评估，包括开展基于301调查的评估、中国执行2020年1月15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情况的评估以及对中国 USTR 地位的评估。这些评估预计需时三个月或百日并将最终得出结论。尽管特朗普多次表示双方领导人可能很快会面，但双边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及技术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目前并不乐观。

以市场角度解读“特朗普冲击波”背后逻辑及效果

陶冬 淡水泉（香港）总裁

以下观点整理自陶冬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1期）上的发言

一、市场视角下的“特朗普冲击波”影响

2024年11月5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市场无法确定“好的特朗普”还是“坏的特朗普”究竟会真正出现。若以2024年和2025年之交为分水岭，2024年最后两个月市场普遍预期“好的特朗普”将出现，因此“特朗普交易”盛行，股票、债券、美元、比特币等均呈现上涨态势。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市场预期特朗普内阁将通过提高美国经济效率、投资效率，推动去极左化、减税等政策。市场对这些预期用真金实银表示认可，市场当时普遍认为“好的特朗普”将出现。

然而，进入2025年后，市场情绪出现了转变，开始担忧“坏的特朗普”出现。具体表现为，关税战不再局限于个别国家或少数产品，而是几乎对所有盟友和贸易伙伴全面开战。美国对其前五大进口国均以不同名义加征关税，此举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被加征关税的国家纷纷采取报复措施，提高或威胁提高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马斯克在削减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方面的举措较为激进，导致大量联邦预算被删减，众多联邦雇员被停职或裁撤，这一系列措施使得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上升，PCE（个人消费支出）通胀上升，而 PCE 消费则呈现下降趋势。市场逐渐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看到美国可能再次出现滞胀局面的迹象。当然，使用“滞胀”一词需谨慎，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并非上世纪70年代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与结构性衰退的组合，但美国通货膨胀的下行速度确实在放缓，甚至出现反弹，同时美国经济发生轻微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这对美国资本市场和整体经济都不是好消息。美国股市已经跌至美国大选之前的水平，市场以实际行动对特朗普想建立的经济、民生、社会秩序以及国际贸易秩序投下了不信任票。

市场上当前还存在一种观点，即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意引导经济进入衰退。从逻辑上分析，如果美国经济在当前出现温和衰退，要比在明年中期选举前出现衰退、交易崩盘和消费大幅下滑等情况，对共和党可能更有利。此外，一旦经济出现轻微衰退，也为美联储后续降息提

供了空间，同时有助于降低美国国债的发债成本，有利于控制美国债务的无序增长。从这一角度而言，特朗普政府对当前出现一次轻微衰退或许并不特别在意。个人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大，虽然这并非必然事件，但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在下调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美国 GDP 的预测，反映出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新政引发衰退的担忧正在明显上升。

然而，尽管市场普遍认为贸易战等因素可能导致物价上涨或物价下降速度放缓，但并未预测到会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反弹。这大概是市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因此，即使出现一次轻微的经济衰退，也可能是自我诱导的结果。既然有能力引导经济衰退，那么在适当时机调整政策以重新拉动经济复苏也是可能的。

因此，当前美国实体经济出现崩盘的风险并不大，但美国资本市场由于估值过高，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产价格波动。今年美国的风险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导致市场出现螺旋式下滑的可能性大于实体经济的崩溃风险。

二、特朗普的核心理念与战略意图

海内外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难以捉摸、不可预测的人物，其战术运用的确变化多端。然而，从战略层面来看，特朗普的立场却异常稳定，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展开。所谓“MAGA”，对内而言，首先，特朗普希望彻底铲除奥巴马、拜登连续执政期间所形成的“白左”思潮，推动去极端化。其次，他意图打破美国的深层政府结构。在其第一届任期内，尽管雄心勃勃，但受到政府建制势力的制约，许多政策难以贯彻实施，甚至出现“政令不出白宫”的说法。在失去连任后，美国建制派政府又对其采取了一系列追杀式措施，使特朗普心怀恨意。第三，特朗普希望建立一个他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经济运营体系，即低税率、高关税、去监管以及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他确实在这一方向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且由于共和党同时掌控了白宫和参众两院，他在推动政策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权力，其政策推进的力度也较为迅猛。

“MAGA”在海外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彻底打破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经贸地缘政治秩序。这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特朗普认为许多国家在贸易中占了美国的便宜，导致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二是他认为部分盟国在军事开支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其二，从自身利益出发，特朗普正在全力扭转这种局面。这也是其在第二任期间不仅针对中国，而是几乎涵

盖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和军事盟友的原因。其三，在地缘政治方面，他希望尽快从乌克兰问题中脱身，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

“MAGA”在金融领域的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推动美元资产价格上涨。特朗普对金融资产，尤其是股市极为关注。在其离任时，可能会列出一份成就清单，其中美元资产价格上涨将是其中重要一项。

其二，重组美国债务。过去五六年间，美国债务负担及利率开支急剧上升，债务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同时这也开始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特朗普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实施债务重组，将美国当前所借的两年期、五年期、十年期乃至三十年期国债，尤其是那些依赖美国在贸易和军事上支持的海外国家所持有的国债，全部置换为50年期或100年期的长期国债。通过这一举措，美国将不再担忧国债市场的短期波动，实现类似于永续债的效果。债务重组是实现“MAGA”的重要步骤，因为这将有助于增强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进一步巩固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特朗普的一些举措具有可行性，而另一些则面临诸多困难。例如，他试图通过关税手段将全球产业链重新拉回美国，但这一目标面临重重挑战。一个典型例证是美国试图通过威胁与利诱，将台湾地区台积电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迁至美国亚利桑那州。然而，台积电指出，美国在某些方面难以满足其生产需求。以台湾地区发生地震为例，台积电工程师能在两小时内迅速返回办公室进行设备调试，因为芯片生产需要极度稳定和平衡的环境，一旦发生地震，整个生产流程需要重新调试。台积电向特朗普表明，在美国难以找到如此多的工程师愿意随时响应类似情况，而特朗普对此的回应是亚利桑那州没有地震。这反映出他对产业的理解以及对竞争性等问题缺乏深度洞察，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似是而非，类似情况在许多问题上均有体现。

然而，特朗普在某些领域或许仍能有所作为。就关税问题而言，其对全球征收关税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因为与其他方面相比，关税收入终究是有限的。他真正的意图是通过关税手段将产业链重新吸引回美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强大的产业链优势，使其能够大量生产航空母舰和飞机等军事装备。而如今，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已经显著削弱。

无论特朗普的意图如何，“MAGA”的进程无论是在国内政策、对外关系还是金融领域，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混乱和秩序的崩溃，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战略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尽管这一因素具有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能否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政坛的钟摆大概每几十年就会摆动一次，而特朗普主义不会随着特朗普离开白宫而消失。美国的共和党已经逐渐演变为“特朗普的共和党”，而民主党近年来则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因此，4年后总统职位可能仍由共和党掌控。当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与其当前的政策和行动密切相关。

三、对中国的启示及应对策略

从中国应对的角度，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特朗普主义长期化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的准备。这一趋势具有长期性和周期性特征，其背后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中产阶级的相对萎缩，进而导致政坛出现极端化倾向。第二，中国必须着力发展内需市场，立足自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内需。虽然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只要内需市场稳定，许多问题将更容易解决。第三，中国既要与美国保持对话，也要积极改善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是因为当前国际社会已进入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04
Add: 1104, Li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